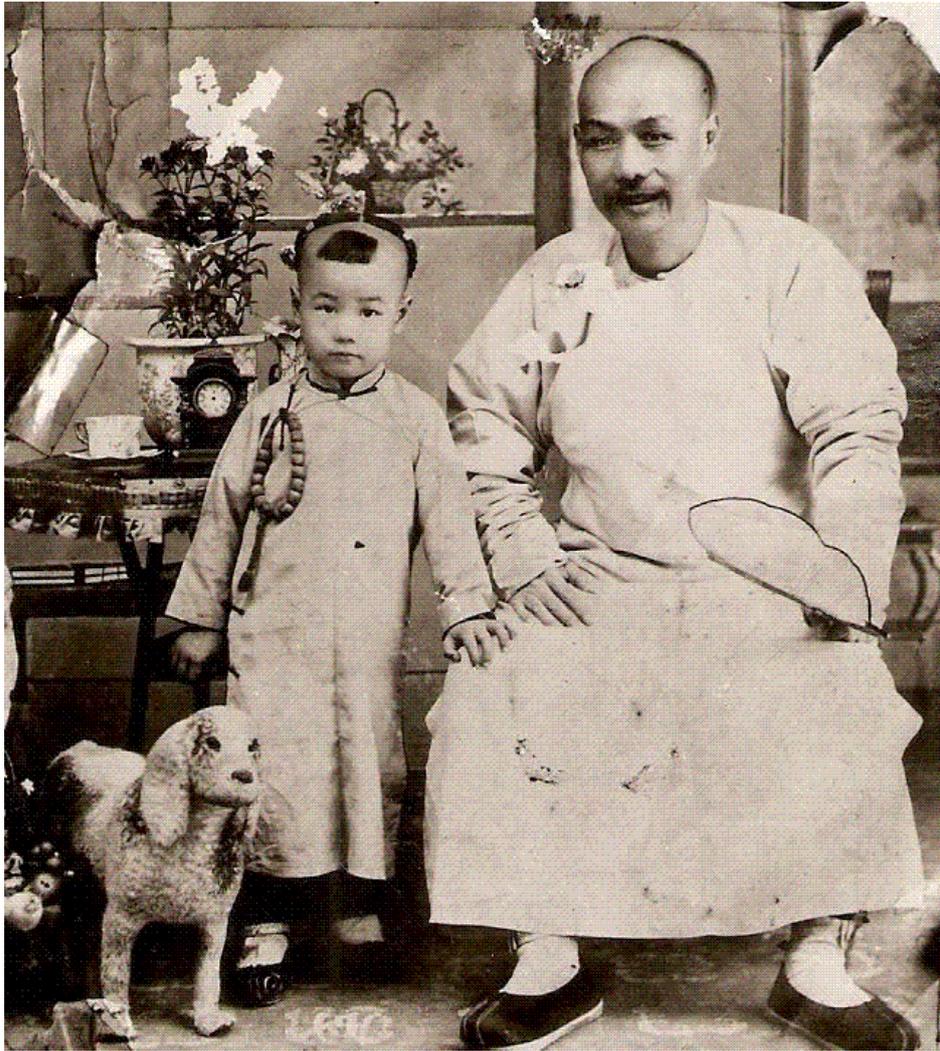


近代文学琴声

# 近代文學琴聲

第8期

Qin Tun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8



福建工程学院·林纾文化研究所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 本期要目

2010 年世界林纾文化研究情况综述 苏建新 3

林纾与中国近代文学史 李建 12

林纾与辛亥 李建 13

林纾言情小说的爱情伦理及其文化意义 张俊才 14

林纾与《东方杂志》 王勇 20

林纾和他的《闽中新乐府》 郭建鹏 郭建辉 27

闽都大讲坛“人文林纾”讲座走进福建工程学院 35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 2012 年将在湖南大学召开 38

2011 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小说分会年会综述 刘青青 龙莹莹 39

徵稿 45

网址: [http://czjr.blog.hexun.com/69952056\\_d.html](http://czjr.blog.hexun.com/69952056_d.html)

# 2010 年世界林纾文化研究情况综述

2011年4月20日，笔者使用学校图书馆资源搜索“林纾”，万方网共找到75篇符合条件的论文，清华同方网是45篇。而3月24日在中国知网数字出版物超市搜到的是96条，包括了报纸和会议上出现的相关文献。加上个人经眼的书籍和海外专家邮来的期刊、论著，笔者搜集到的2010年林学文献达100多项，已经大大超过了往年。

## 一、对林纾文化立场的再认识

河北师大张俊才教授在福建工程学院学报发表《林纾的“中学”观》、《林纾的西学观》二文，<sup>[1]</sup>并在《林纾文化立场的再认识》中总结指出：“林纾的文化立场仍可以用‘中体西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但‘体’的含义是强调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独有价值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性必须坚守，‘用’的含义是强调西方文化可以激活中华文化并使之实现现代转型”，表现出林纾试图儒化西学或者援西学以入儒的意图。在赣州中国近代文学年会上，张教授提交了《林纾：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今仍持新文学立场的学者否认林纾为保守主义，理由是西方此派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张教授认为不能胶柱鼓瑟地片面理解这个概念。应该说中西方的传统拥护者，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保守他们认为“美好而有价值的传统”。对西方人来说，他们要保的是自由，而林纾保的则是古文，孔子主张的伦理等传统文学/文化中美好的东西。

九江学院姚建平、龚连英肯定林纾的儒者人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认为林纾虽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但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反对解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淮南师院胡焕龙教授认为历史歧路上的“伤心人”林纾，晚年以“情—礼”调和的言情小说建设他心目中的“和谐王国”，企图以此寻求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坐标。

广西马德翠博士探讨了林纾的女权思想和国民性焦虑，认为他对国民性的剖析，甚至触及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并且还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和途径。林纾的女权思想始终扣住“女学”这个关键字眼，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接近女权主义的核心。

## 二、对新旧之争中的林纾的评价

**1、否定方** 《社会科学战线》上《1919年：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新青年〉6卷2号一则“启事”背后“史实”考辨》一文，说林纾“把北大和《新青年》捆在一起打”，蔡元培极力辨明的是攻击者“混为一谈”，制造种种“谣言”，显得十分被动，不同于《每周评论》设《特别附录》汇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27篇文章的正面反击，也与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以正视听有别。联系《〈新青年〉编辑部启事》发表后半年多时间里新文化的走向，可以看到，这则“启事”所预示的校与刊结合的“中止”，又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分化的表现，新文化开始发生“分流”。

吉林大学张福贵为“文化五四”辩护，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化结构并不只有激进反传统一边，还有激进保守传统一端。保守传统同样是可以激进偏执的。不仅有激进的左翼，还有激进的右翼。对于传统文化的维护，与当下政治权力一起构成文化专制和思想暴力。如林纾著小说《荆生》攻击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转载该小说，并在编者按语中称荆生乃是暗指徐树铮，“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

樽本照雄、陆建德等中外学者近年作文为林纾叫屈，认为把“荆生”与徐树铮联系起来，是陷林纾于不义的一种手段。《同舟共进》上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徐树铮：现实中的“荆生”？》一文“以为是有些不妥”。他谈到，“即便林纾主观上并没有以‘荆生’暗指徐树铮之意，新文化人士也有足够的理由，从‘荆生’想到徐树铮。说新文化人士将‘荆生’认作徐树铮是一种‘运动之术’，那才真是厚诬了新文化人士”。

孙玉祥《现代文人的隐与痛》一书开篇即坐实此事，认为“伟丈夫”正是北洋三杰之一徐树铮。由于他的冤死，“林纾想借武力来行文化专制的希望当然也就成了泡影”。次篇又把他跟梁实秋捆在一起揭批，说他们都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典型的狐假虎威与狗仗人势”。

《陈独秀抨击“桐城派”探因》一文认为陈独秀抨击“桐城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势力成为了现实阻力，对林纾和桐城派的批判成为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的《新青年》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新青年双簧戏的主角之一钱玄同偏激思想也得到考究。《游移于互助与竞争之途》认为“林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对抗新文学的西化是偏激”，而钱玄同“以偏激的姿态剪裁进化理论，而被简化了的进化理论又助长着他偏激的思想言行”，其偏激姿态与进化思想可谓相生相长，促成了他参与运作“双簧信”宣扬文学的新旧对立等等。

**2、肯定兼否定方** 王学斌《另一半的“五四”》觉得“五四”当时的文化版图，并非只有新文化战士一马独行，挥洒激情，而且那些旧士人也组成了另外一番光景。林纾“笑骂由他我自聋”，按照北京俗话讲，这老头够“轴”的！有股子十头牛拉不回来的倔劲。既表现在拒绝为当国袁氏的捧场上，也显现于孤身一人同陈独秀、胡适、上演“苦肉计”的刘半农、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舍得一身剐之时。

南开大学耿传明先生《决绝与眷念》第三章指出林纾与“新青年”派的文化对峙，是生活于两个世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立，不管是信奉传统主义一元论的林纾，还是追求新的价值一元论的“文治主义”的“新青年”，都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性以及内部的冲突，缺乏充分的了解和体认。<sup>[2]</sup>论战双方显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确保公平讨论的公共空间的重要。

**3、肯定方** 季雪、余霞《再评新文学论争中的林纾》认为林纾与对手的此次论战，对白话文的推广、新文化运动的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备受指责的林纾的评价和此次论战的动机与目的，都要放在历史和政治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和评价。

程巍先生《谁领导了1916-1920的中国文学革命？》（《中国图书评论》第3期）指出，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的时间（1916年6月-1920年7月）与文学革命从发起到成功的时间（1916年8月-1920年4月，或按胡适的划分，从1917年1月到1920年1月）并非偶然重叠。而后来胡适建构的一部中国文学革命史，却把文学革命的宏大场景中的一个小小局部（《新青年》或北京大学）

无限放大，放大到足以遮蔽全景的地步，文学革命就变成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而革命真正的领导中心匿而不见了。林纾与安福系首领徐树铮确有师生私谊，但私谊不等于政治关系。“考据癖”患者胡适为他指控的“守旧势力”林纾与“黑暗势力”段祺瑞及其安福系的同盟关系出具的唯一铁证，是林纾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恰好姓荆，而荆州恰好与徐州离得不远，而徐树铮又恰好姓徐。看来，考据学也可用来发明历史。

李慶國先生《从诋毁林纾的“双簧戏”谈起》，提出了《對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的一點質疑》，他指出林信中提出的问题和蔡信中归纳出来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不同，简而言之，即蔡答非所问，改换概念，强化了林纾据谣诼攻击北大和新文学倡导者的蛮横无理印象。而以往现代文学史和教科书却缺少细致的比照阅读和具体分析，对蔡信“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赞誉”，造成了长达九十载的“不应有的忽略”。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的那场“双簧戏”，长久以来一直被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而其手段低劣和有违程序正义则很少有人置疑。这些主流话语的描述和评价都是站在五四新文化阵营的立场作出的，手法是扣帽子、打棍子和无线上纲，对林纾的言行缺少客观描述和分析，自然也无严谨与公允可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簧戏”可谓开启了现代传媒借舆论阵地利用造假手法进行炒作的先河，对思想和文学、文化的论争也产生了负面、不良的影响。<sup>[3]</sup>

福建工程学院朱晓慧教授主编的《国学新读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 年 9 月）认为《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中，作者按旧习惯称他为“太史”，既表示作为遗民，不忘前清制度，也带有提请对方不要忘记本，追思前朝遗爱的味道。林纾出于对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主张的不满，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他能以主长北大的身份，约束他的属下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钱玄同、刘半农等激进人物，“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使教育回复传统轨道。当然，在新文化全力推进、摧枯拉朽之际，林纾调和新旧思想、文白雅俗的举措只会被时人视为保守的表现。在当今国学复兴、全力参与现代化建设之际，我们方能体会老“维新党”的林纾在社会进步、西化成风的时刻，渴望青年一代守住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苦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研究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林纾》认为林纾其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不过，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一系主流话语来说，他们将林纾定位为反对派、守旧者，也是有根据的。其中根据之一是林纾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胡适等人在后来回顾建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时，有意无意忽略了林纾的贡献，片面扩大了林纾的反对意见，林纾基本上被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甚至带有莫名其妙的小丑色彩。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张俊才教授《林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争史事編年》采用最原始的治史之法，为林纾与新文化派之争做了一个“年表”，通过事件前因后果的显现，还原了以下事实：第一，林纾不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主动挑起者。第二，林纾《荆生》、《妖梦》谩骂对手过甚，但就此数次公开认错，这对孤傲的名人林纾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新文化派谩骂对手，较之林纾并不逊色，这使我们看到新文化派诸公意识深处也存在一个旧文化的幽灵，这就是封建的“王侯意识”。他们标榜“平等”，但骨子里却不承认反对者在人格上与之平等；他们推崇“民主”，在思想上却未想到与反对者展开民主讨论……林纾何以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定为首选对手呢？张先生认为主要原因不外两个：其一，林纾入民国后逐渐成为

旧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其二，林纾是近代“老新党”在文学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主张“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派为了夺取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话语权，他们就必须向“老新党”、旧文学发难，这场夺权之战如果不波及到文学领域，林纾就会平安无事，一旦波及，“林纾就‘在劫难逃’，因为‘老新党’人物中，只有林纾此时还一如既往地坚守在文学战线上”。

### 三、对林译小说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依然是历年出现最多的，虽有彼此撞车的选题与老调重弹，终究是看点甚多，魅力无穷。

#### (1) 茶花女—伊索寓言—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鲁滨孙漂流记—不如归—紅篋記—She—雨果等

临沂师院孙敏透过《巴黎茶花女遗事》“玛格丽特”的重塑，指出译者在处理原著的人物性格或是外貌的描写上，都制造出了和原文大相径庭的效果。中南大学刘园从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看到了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的影响，这部法国小说以往很少被法语研究者结合勒费福尔的理论列专题分析过。贵州大学杨丹屏也用相同理论（Andre Lefevere）分析了林译《希腊名士伊索寓言》两则寓言背后的文化操纵和制控。

6篇以上研究《黑奴吁天录》的论文中，福建师大林佩璇副教授从话语修辞角度，审视了林纾翻译的归化现象，也借此探寻了林纾翻译现象的内在成因——林纾长期人生积累而形成的元认知促使林纾自然地采用归化修辞。林纾对原文的选择是有目的的，他选择翻译那些能表达他政治理想的作品（潘悦），意识形态对林纾翻译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孙艳燕）。山东大学张文龙的硕士论文引用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通过对林译《黑奴吁天录》的个案研究，证明了翻译和权力双向互动这种论题的有效性。（韩）김소정(Kim So-jung)的*Translation and Refraction: Reconstruction of Tom's Cab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认为经过林纾的再创作，《黑奴吁天录》成为一部宣扬反美帝国主义的翻译文本。再由中国留学生话剧团体春柳社改写成剧本，在东京上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

牛津大学刘倩论述了杨、包译《迦茵小传》的创造性叛逆及其相关问题，如译者为了维护女主人公的道德纯洁性而苦心经营，进行了许多删改。福州大学潘红教授指出林纾通过修辞重构，以本土的话语方式改写了迦茵形象，使译本与原著在人文精神方面产生了距离。上海大学杜俊芳着重从意识形态、诗学、译者的文化资本及经济因素三个方面分析《迦茵（茵）小传》两译本异同的原因。

福大潘红教授从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文本视角，管窥了林译小说对中国传统叙事文体所产生的影响。她还以书中三则比喻的修辞设计为例，说明认知图式与文本的修辞建构的关系。<sup>[4]</sup>安徽师大罗奕将吕贝珈与《红楼梦》中的尤三姐对照后，认为这两位女性人物在外貌、性格、抗争等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大学崔文东《晚清Robinson Crusoe 中译本考略》梳理了从1902至1910年的各种笛福小说译本，相对于沈祖芬等更早译出的“鲁滨孙漂流记”，林译本已经易为水字旁的译名。他还对照沈、秦与林译三部译作，指出他们冲击了本土传统，也颠覆了种族主义话语。但是，译者政治上反殖民，文化上却屈从于西方，一方面改造殖民主义话语，同时又受制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安徽大学方韵运用勒菲弗尔等人的翻译思想，揭示意识形态对译者及其所译《鲁滨孙漂流记》的影响作用。

复旦大学邹波对林纾转译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之底本进行考证。日本渡

边浩司《林译小说〈红篋记〉などの原作(下)》继续探讨了林译与Headon Hill原作Seaward for the Foe、Perils of the Red Box对照下的具体情况。

天津师大郝嵐分析了哈葛德小说的首篇中译《She》从曾广铨到林纾的流变，林纾将《她》更名为《三千年艳尸记》。她认为相对于曾译《长生术》，林纾对哈葛德这部名作的翻译“全面、准确得多”。

大阪经济大学樽本照雄先生在《施蛰存による林纾冤罪事件》中，对施蛰存在《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前言指出的林纾缺点进行了辩正，认为林纾用福州方音将雨果译成囂俄，另一部雨果《九十三年》的作者又变成“预勾”，造成不正确的译名一直被许多译者沿用的“罪名”并不成立。樽本先生的《ユゴーの漢訳名囂俄について》上下篇，对汉译“雨果”以前普遍使用的译名“囂俄”作了详细考察。指出《新小说》第1年第2号(1902.12.14)最早出现“囂俄”一名，附有作者像、英文Hugo和《小传》，同时也有译作“雨苛”的。此前日本多用雨果法语的译音ユゴー，梁启超曾据此译为“姚哥”，而“囂俄”的无名译者则是据Hugo、英译ヒューゴ译出的。

#### (2) 严复、鲁迅、庞德等与林纾的比较

5篇在“译才并世数严林”上做比较的论文，肯定严林的翻译为成功的翻译(刘明)，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苏超)。他们采用的翻译策略符合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观点(许春翎)，知识背后的政治塑造了二人的中国文化身份(李扬)，大多数读者的普遍认可，确保了他们最终取得极大的成功(刘明)。

“痴迷”后又“背离”林纾的鲁迅，两位大家“无论是从文化造诣还是在文坛上的影响力来说，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却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有了一种在形式上貌似完全相反在本质上却一致的某种契合”，因为他们都出色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异曲同工地把翻译变做了推动中国进步的工具(陶兰)。从林纾、鲁迅的翻译可看出翻译批评具有多重视野的必要(刘云虹)。

从文化视野比较中西译坛奇才林纾、庞德，发现他们的翻译策略虽然有别，却都推动了本国文学的发展，且对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巨(袁素平)。

#### (3) 各种方法论视角下的林纾翻译

被学人用来解读林译的新方法包括多元系统理论(何红、许春翎、任娟娟、刘进军、黄雅兰等)，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边立红、阮红梅、罗天靓等)，巴赫金对话理论、接受美学(文月娥、孙开建等)，Toury翻译规范理论(王淼等)，后殖民翻译理论(刘洋等)，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思想(崔彩卉)，等等。多种理论的反复尝试，被不少论者看作是为人们理解林纾翻译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 (4) 林纾的“误译”(伪译)与“讹”

林纾的翻译或被称为“整理”(万宗琴)，或叫作“伪译”(赵护林)。从翻译伦理的理论视域出发，能窥见林译小说中“误译”不可避免的理据(罗虹)。林译之“讹”，有无心之过，也有有意之为(蒋雯雯)，后者“理所当然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吴双)。置身晚清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不能不肯定以《茶花女》为典型的林纾“创造性误译”代表了当时翻译文学的最高成就(裘禾敏)。钱钟书先生曾指出“讹”乃是翻译的本性。从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林纾的译本中的“善讹”是可以宽容、肯定甚至鼓励的(林娜)。对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钱钟书多半持肯定态度，但他对林译的态度还是“有些许暧昧的，就像评价虽够不上正统优雅的大家闺秀，却性情率直”(申星钰)。

#### (5) 综论

《吟邊燕語留餘韻》一文对新文化人“双簧戏”中所涉林译小说书、篇的命名“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它们的确很有意思，或为“纪”、“记”，或名“传”，或曰“录”，或作“遗事”、“史”、“外史”、“志异”等，大多根据小说内容灵活设定，刘半农等人仅从书名来判断，难免生出望文生义之解，肆意歪曲林译“肉麻”、“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多少”。在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百十周年之际，从林译小说书、篇名的设计、揣摩来体味林纾古文译述的那份潇洒与斟酌的踟躅，亦不失为一桩快事。

台州学院高万龙教授从文化的角度透视出林纾与口译者对原作的选择与反应，立足于林纾紧盯目标文化，充分考虑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在题材、内容和风格的相似性之上。他的探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林纾翻译在 20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和重要性。<sup>[5]</sup>

华东师大刘宏照博士的学位论文选择商务印书馆 1981 年重印的林译小说为对象，运用语言文化综合研究法，从七个方面比较细致地挖掘和梳理了前人在林纾的小说翻译研究上留下的问题空白。对时人热衷采用的各种国外翻译理论，他认为可说明林纾翻译小说中的某些现象，却难以解释林译小说中的另外问题。在林纾翻译策略的这个热议话题上，本文更深入地探析了与归化策略同时采用的语言策略、异化策略和注释策略。指出林纾的翻译小说，虽然以归化为主，但其中的异化策略也时有所见。在注释策略上，包括括号内加注，改原文为注释，改注释为原文，译者直接介入等等，其手法别具一格。

作者自省的不足主要在于“研究范围主要限于‘十大林译小说’”，联系他在绪论中提及的此前唯一的林译研究博士论文，其中考察对象也限于重点讨论林译代表作（两部言情、两部世界名著及《黑奴吁天录》等），可见这未尝不是国内高校学人因袭下来的不足。

#### 四、林纾的艺术成就

将林译与他的书画成就综合分析的是兰若的《林纾的译才与丹青梦》。在叙述了天赋译才与《茶花女遗事》的产生，唐·吉诃德式的古文“英雄”对新文学作家的影响后，作者又介绍他精深的水墨丹青造诣，并以其收藏的林纾山水条幅（“从无俗客扣岩扃”）为例，说明他不仅画风高古典雅，书法也是静穆妍美，风韵独到，别有文人翰墨趣味。

张英从 1921 年林琴南、张之汉赠谈国桓的两幅特写画入手，追溯三人交往的文人佳话，说明了当年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平叛的背景。由林纾的《匹马从戎图》，不难见出他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戎马书生事”的推崇。

林纾花鸟画创作经历了早年习画期、风格形成期、成熟期的发展演变。龚任界结合具体画作，加以探讨，指出林纾的花鸟画兼收并蓄元明清画法，超越地域界限，冶“京津”、“海上”诸派画法于一炉。

上海好运分析了梅兰芳、季观之等六位“小名头”的书画家的市场潜力，认为清末民初不能缺席的画家林纾，近几年作品价格有较大攀升，后市值得藏家关注。

#### 五、林纾的诗歌古文

上海师大博士高兴认为林纾的古文观别具一格，他提倡“正言”和“体要”的统一，重视“意境”的营构，在价值取向上既强调“政教”效果又不忽略“娱悦”作用。尽管林纾和“五四”新文人在古文的历史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冲突，但两者的“风雅”之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情结。

郑州大学刘素萍从鲜人问津的林纾山水游记文学入手，分析了它在结构模

式、写景技巧、创作理论上的创新色彩,认为“在我国山水文学史当有一席之地”。福州大学卓希惠对林纾传记文史传艺术也作了探析。

对《闽中新乐府》这部让林纾初登文坛的诗集,长春师院姜国、郭建鹏先生从“末世悲悯与救世之音”的角度做了剖析,指出具有维新改良精神的林纾在民族危亡之际,以“乐府”的形式传达了他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和妇女的关注,在当时的语境下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和时事性。

## 六、林纾的文学(批评)思想

湖南师大赵炎秋《林纾叙事思想试探》(《文学评论》)认为林纾多方面接受了西方现实主义叙事观念,重视小说结构的系统与完整,肯定结构严谨、构思严密的作品。对于欧美小说的叙事模式、倒叙等叙事技巧,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韩洪举提交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论林纾对中外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总结了林纾在比较文学研究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指出他不但比较中外作品,还将自撰小说与之对比,尤其是“外外比较”(即外国不同民族之间的小说进行比较),“是对比较这一研究方法的一大开拓”。广东商学院周小玲《林纾副文本的文学思想》从林译小说79篇序、跋、识语等副文本入手,解读了林纾以甘做“叫旦之鸡”为中心的文学思想,认为虽然没有多少理论文章,但“林纾的文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

## 七、林纾的教育思想

中国社科院毕苑女士从林纾的《修身讲义》入手,探讨了这位终身第一职业为教师的林纾在“建造常识”的近代教科书演进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作为科目的“修身”课,可能是19世纪从日本引入我国。它以经书为本,讲授人伦道理。林纾这门课的讲义是在他十多年授课的基础上结晶而成的,若置于从“修身”到“公民”的国民塑性的教科书演化中考察,林纾也许“没有达到”同时代知识人(如李嘉穀《蒙学修身教科书》)的高度,但身处清末民初的林纾还是有可贵的突破:他改变了古文自古没有讲义的现状。这部颇费了他一番心思的语录体讲义,时时展现林纾的个性,“有时颇为可爱”,在五城中学堂、京师大学堂预科和师范班、实业高等学堂等多所学堂讲授的效果极佳,“想来学生们一定大感兴趣,并且服气”。<sup>[6]</sup>

林纾的爱国教育思想也在福建工院张丽华副教授的论文中得到分析。这是她继《林纾教书人生论略》后对林纾教育成就所作的进一步探讨。

## 八、林纾的交游生平研究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严复和他的朋友们》(三)(《名作欣赏》上旬刊12期)研究了林琴南与严复的好友关系。严复羡慕比自己一岁的林纾早中举人,这位孤独先行者的后期思想,无疑受到了与之交游的林纾等一群遗民“忠义之举”的影响。

柳成栋先生剖析了“林纾与东北名流的诗文交往”(《东北史地》3期、黑龙江日报2010年04月08日)。林纾居京时,与当时寓居北京的黑龙江名流交往最多最密的是成多禄,民国第一任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哈尔滨名士马忠骏、依兰道尹阮忠植等其他东北名流也多为成多禄介绍相识。他们交往的主要形式是诗书画文。目前虽然尚未有明确记载他是否到过东北,但林纾与吉林、黑龙江的社会名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吉黑两省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子迟先生《中国历代名人情感揭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章“文人墨客”以《林纾与谢蝶仙:花界超级“粉丝”想做教授夫人》压卷,固然可以看出社会上对林纾与现实生活中的茶花女关系的浓厚兴趣依然不衰,然衡之

“苍霞精舍”办学初的历史，却是过早将京师大学堂的林纾职位预支给了当时中学堂性质的该校汉文总教习。至于谢蝴仙入籍八大胡同（这正是陈独秀遭旧派攻讦的出入之地），或许会令《秋悟生》中的榕城谢娘百思不得其解。

福建工院林纾所苏建新对前人弄不大明白的林纾在京寓所问题，做了新的发掘，补充了永光寺街、芝麻街两处以外的另外3处：绒线胡同、棉花头条、下斜街。并说明林纾不愿在京置办固定房产的原因。

### 九、有关林纾的研究文献及综述

樽本照雄先生80年代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本年又有第4版（CD ROM）光盘问世。输入检索词“林琴南”、“林纾”、“畏庐”，可以查到从A0052、A0059、D0998到Y1859、Z0834、Z1258的作品大量信息，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苏建新对上一年中外林纾研究状况的述评文章也赶上了年关末班车，在闽江学院学报上得到公开发表。

### 十、作者、刊物排行榜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外林学研究成果在两篇以上的有10余位作者：

张俊才（河北师大），李慶國（日本追手門大学教授），潘红（福州大学），樽本照雄（大阪经济大学），崔文东（香港大学），马德翠（广西区委党校），文月娥（湖南科技大学），刘明（浙江财经学院），柳成栋（黑龙江地方志办），苏建新（福建工院），龚连英、姚建平（九江学院）。

限于笔者所知，中外2010年发表林学论文的刊物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八家：

- 1.清末小说から（通讯）及清末小说（8篇）
- 2.福建工程学院学报（6篇）
- 3.安徽文学（文教研究）（4篇）
- 4.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篇）
- 5.青年文学家（2篇）
- 6.考试周刊（2篇）
- 7.时代文学（2篇）
- 8.赤峰学院学报（原《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篇）

总览2010年世界林学，可见林纾的研究已经不囿于国内及对他的翻译的有限探讨了。21世纪的林纾研究在头十年结束之际，已经开始朝文化透视、多元综合的方向迈进，并愈来愈为世界各国、神州各地学人所青睐。

### 参考文献

- [1] 张俊才. 林纾的西学观[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10(5).
- [2] 耿传明. 决绝与眷念: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12.
- [3] 李慶國. 从诋毁林纾的“双簧戏”谈起[J]. 清末小说から第96号, 2010(1).
- [4] 潘红. 认知图式与文本的修辞建构——以《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三则比喻的修辞设计为例[J]. 中国文学研究, 2010(3).
- [5] Wanlong Gao. *Lin Shu's Choice and Response in Translat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Issue

13- January 2010.

[6] 毕苑. 建造常识: 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174.

[7] 苏建新. 2010年世界林纾文化研究文献目录[C]. 清末小説から第103号, 2011年10月1日. [http://czjr.blog.hexun.com/66396995\\_d.html](http://czjr.blog.hexun.com/66396995_d.html)

## Lin Shu Studies' Stepping to the World and Culture in 2010

SU Jian-xin 苏建新

(Institute of Lin Shu Culture,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jian Fuzhou 350108)

**Abstract:** Lin shu studies in 2010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fruitful.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domestic and his translation, research on Lin shu has started to comprehensive direction and taken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place favour on it all over China and abroad.

**Key words:** 2010, world, Lin Shu Culture, Studies, Overview

清末小説から(通説) no.103/2011.10.1

<http://www.biwa.ne.jp/~tarumoto>

ISSN 0912-2923



商務版「説部叢書」研究の昔と今1……………樽本照雄 1

《醫學小説 鑽崇》の原作……………渡辺浩司12

『清末民初小説目録』第4版問答(下)……………樽本照雄16

傅兰雅“时新小説”征文获奖作品序文鈔(上)……………刘 德隆26

2010年世界林纾文化研究文献目录……………苏 建新30

清末小説から25、35

★『清末小説』第34号を発行しました。目次(本誌25頁)をどうぞ。本季刊誌はネット上での罫

清末小説研究会 日本〒520-0806 滋賀県大津市打出浜8番4-202 樽本照雄方

(本文亦将由山东《菏泽学院学报》刊出)

## 林纾与“中国近代文学史”

李建

解放以来二三十年间，因时势的缘故，“中国近代文学史”著者对林纾给予了歪曲事实，谩骂，污辱人格，极不公正的评价和封杀。斗转星移，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才开始重新认识林纾，反省对他的评价，还予他的人生面目与思想真谛，给他以正确的评价和尊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道义责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良知。

文学是文化的基本构成，它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对文化的研究要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应该反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承认鲁迅的“五四”观为现代文学的正宗，占统治地位，把现代文学作为“党史”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直接提到“五四”又为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的。由此，颠覆了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思想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价值标准，以至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公平公正的理念。简单地将文化分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旧文化—新文化，统治阶级文化—被统治阶级文化……这样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模式。不容置疑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标准就变成了一个消灭一个，由谋一派别“独霸天下”达到所谓高度“统一”。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的古诗文词和包笑天、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都遭到了几位所谓“权威”的老先生的反对。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存在，所以我们要从中摆脱出来。21 世纪的中共党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优秀传统文化的反思，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理应成为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借鉴和榜样。

旧版文学史把钱玄同、刘半农对林纾人格污辱，不耻于文化道德的“双簧戏”加以美谈；且制造林纾（借助）军阀炮轰北大的神话。经有良知、负责任的史家认真考证，认为：尽管林纾与徐树铮有私交，但林纾依然保持着独立的文人身份。新文化阵营把小说中“荆生”附会为徐树铮，一时传闻四起，有的说徐树铮景山（架）炮轰北大，有的说运动国会弹劾蔡元培，如此等等。但这些都是道路传闻，至今仍查无实据，更重要的是传闻中所说的事实根本就没有发生。其实不仅是陈独秀说到此事时都使用“听说”之类的字眼，表明它只是传闻，而近年来有多位学者撰文对此事进行考辩并予否定。然而，我们的史家却依然置基本事实于不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子虚乌有的传闻，莫非说文学史在史料采撷上也可“文学化”？“小说化”？在此，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缺失了。

重读王元化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从事新文化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吸收外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民众期待着新时代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真正的史家。

## 林纾与辛亥

今人纪念和继承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封建专治的帝制，建立为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共和的政体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翻开沉重的民族历史，朝代、政党频繁更迭，战乱不断，推倒旧皇帝想当新皇帝的封建劣根思想仍不同程度存在，为民、亲民思维常被异化，民族传统文化中“民为贵”的普世哲理亦渐淡忘。林纾出身贫寒，自幼勤奋苦读，传承民族文化终成文学大家，其爱民族，亲百姓，兴国家，厌政治腐败，立志不为官的本能在辛亥革命前后得以尽力彰显。

一、清廷腐败，民不聊生，在“戊戌变法”之前林纾即著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呼喊反帝救国，抨击昏庸腐败官僚，为民请命。变法失败，林纾愤书：然德宗果不为武氏所害，立宪早成，天下亦不糜烂到此，罪大恶极者为那拉氏。

二、为避免重开战事百姓涂炭，林纾力主南北议和，共举民主共和之政体，终使清廷退位，共和事成。林纾与时俱进支持革命，祝福民国，天天祈祷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并欣然接受民国《平报》编纂一职，为民国新政效力献策。同时也勇于抨击民初时局混乱，政治腐败之社会现象。

三、袁世凯称帝，聘林纾为“高等顾问”，委以“参政”之职，林纾严辞峻却，以死相拒。予友人信中道：“洪宪僭号万恶袁贼，曾以徐树铮道意，徵弟为参政。弟毛发悚然。如遇鬼物，抗辞至四日之久。至五日，弟无术自解，面告徐又铮，‘请将吾头去，此足不能履中华门也。’”

四、张勋举兵复辟，林纾始终持反对态度且不与支持参与者严复、康有为为伍。

林纾在民族反对封建专治之帝制，建民主共和之“三民”国体的革命中始终保持着朴实的亲民情结。统治者要真正地为民掌权，为民造福，不谋私利，才是沧桑正道。如反其道行之，历史即为前车之鉴。

（李建先生系林纾外孙。该文亦由福建工程学院报刊出。）



林纾《轻舟探幽》



# 林纾言情小说的爱情伦理及其文化意义

张俊才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林纾言情小说所阐扬的爱情伦理中, 既有一抹现代色彩, 如他笔下的部分爱情故事已“稍稍涉于自由”; 又有浓重的传统风致, 如主张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仪式化, 认为女性应慎守矜持、含蓄、温婉的性情之美, 强调男女双方都不为苟且之事等。林纾言情小说所阐扬的爱情伦理, 折射出民国初年“老新党”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 林纾; 言情小说; 爱情伦理; 文化意义

林纾的小说创作始于辛亥以后, 其中言情占有较大的比重。林纾的言情小说与传统的或五四的言情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言情小说从总体上看都属于“世情书”的范畴, 即作者总是在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人性良窳、人生多舛的世情中言说爱情的发生或变故, 从而达到对世情的针砭。五四言情小说从总体上看更多地属于“启蒙书”的范畴, 它固然也具有传统言情小说批判现实的精神, 但批判的对象却由宽泛的世情内聚为传统礼教, 作家的创作主旨是以此来启发人的现代意识。而林纾的言情小说却明显地属于“伦理书”的范畴。林纾创作言情小说的动机, 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针砭世情, 更不是为了启发人们的现代意识, 而是在宣扬一种他所认可的, 既有一抹现代色彩又有浓重的传统风致的爱情伦理。林纾言情小说所宣扬的爱情伦理, 尽管所言仅仅是爱情问题, 但从中可以窥见林纾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思路。而这, 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和评价晚年林纾, 无疑是有意义的。

## 一、林纾言情小说爱情伦理的现代色彩

甲午战争之后, 林纾就跻身到维新派的行列之中了, 因此他在爱情问题上还是比较开明的。这就使得林纾的言情小说也多少反映出一些时代的变迁, 涂有一抹现代的色彩。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他笔下的部分青年男女已尝试“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了, 而林纾本人对这种行为是容许的。

最能表现林纾言情小说这一特色的, 应该是短篇小说《鬢云》了<sup>[1]</sup>。小说写辛亥国变之年, 少女杜鬢云从武昌来到上海依舅父而居。一次赴照相馆照相归来, 将自己的一帧旧照片遗落在租乘的人力车车茵之上。后来丝商之子陆元业亦乘此车, 遂捡得鬢云照片。从照片上的衣着和题词中陆元业断定鬢云不仅“落落有大家风范”, 而且“书法超绝, 但其孝友, 亦迈等伦”, 于是便开始寻觅和追求鬢云。他不仅以张贴告示的方法与鬢云舅父取得联系, 而且亲至鬢云舅家试图面见鬢云, 后终于在茶寮中与鬢云相见。鬢云在舅父家隔窗窥见陆元业后, 也觉其“音吐风雅, 似为绩学”, 遂生爱意。鬢云父母双亡, 按礼制其婚事应由叔父作主, 但其叔父却极力守旧, 不允此事。在此情况下, 鬢云舅父以“沪上恒讲自由”

为名，“抗颜”成全了陆元业与杜髻云之间的自由恋爱。林纾认为，陆元业与杜髻云的恋爱已“稍稍涉于自由”了，他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且小说一道，不述男女之情，人亦弃置不观。今亦仅能于叙情处得情之正。稍稍涉于自由，徇时尚也。”然而，客观地说，在《髻云》这篇小说中真正“稍稍涉于自由”的，是陆元业而不是杜髻云。有意思的是，在林纾的其他言情小说中，恋爱时能够“稍稍涉于自由”的，却有不少都是女性。这种情况自然与林纾对女性婚姻、女性解放等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关。林纾对女性婚姻、女性解放等社会问题的看法，归结起来不外如下两点：其一，“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其二，要真正使女性从“婚姻自由”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使女性像男性一样接受较高的教育，因为“凡有学之女，必能核计终身之利害，知苟且之事，无利于己，唾而不为。”<sup>[2] (P226)</sup>正因为林纾对女性婚姻、女性解放等社会问题持这样的看法，因此他笔下的那些女性，基本上都是接受过一定文化教养的“才女”，其中有的还留学异域，她们自然都属于林纾所说的“能核计终身之利害”的女性，因此，林纾也就让她们都“稍稍涉于自由”了。且看如下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怎样追求自己的爱情的：

《裘稚兰》中的裘稚兰是一位侠女，为报杀父之仇潜入京师。一次郊游时忽遇大风，裘稚兰的领巾被风吹至书生吕秋士的肩上，“旋风数匝，竟环此领巾于生颈上”。秋士“眉目如画，然胸中卷轴至富”，裘稚兰一见即生爱意，于是便开始了对吕秋士不舍的追求。她先是在吕秋士夜读时，以侠技不露踪迹地向吕秋士赠送笔墨、食物、砚台、竹如意、玉箫等。吕秋士以为遇到了慕色之女贼，于是迁至别处。但裘稚兰又寻踪而至，并以同样方法赠以裹着红线的金戒指。此时，吕秋士“应京兆试，以通《毛诗》列魁选”，求婚者甚多。吕母每得求婚之帖，必供诸祖宗木主前求阴灵指示。但裘稚兰每次都在深夜潜入吕家，在求婚之庚帖上题写“勿许”二字。此时，吕秋士已醒悟到，屡屡向自己示爱的人可能就是那个在郊外风中邂逅的裘稚兰，而自己也甚愿得裘稚兰为妻。最后，在水月庵盲尼的帮助下二人结为夫妻。在这个爱情故事中，裘稚兰虽为一女子，但她不仅自选意中人，而且一旦打定主意之后，就锲而不舍地追求，直至目的实现。林纾很清楚他写的这个人物是爱情的主动追求者，故他在跋语中说：“想兰母必迷信，见旋风之卷领巾，胡以不先不后径扑吕生之颈？则鬼神作合之说，已深中其心。而女意则但悦吕生之美，想入都又必闻其文名，故益属意。观庚帖上之署‘勿许’，入门时之娇妆出见，是直自荐耳。”

《桂珉》中的蔡桂珉，虽说是一位富家女，但也可以说是一位村姑。和一般村姑不同的是，桂珉从小就受到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桂珉的母亲虽然不幸去世，但其父蔡翁却宽厚仁慈，对桂珉并不严加约束，这又使桂珉的天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平日不事梳掠，恒以鱼白之绢裹头，双鬓如漆，露诸绢巾之下，耳钳小珰，玉貌樱唇，天然入画。”正因为这样，在桂珉与同村贫家子谢玉井的恋爱中，桂珉时时处于主动地位。当玉井给蔡翁送鱼初至蔡家时，桂珉见其“年可十八九，两足如霜，冠簪笠，发辫盘其颈，明眸皓齿”，即“已定终身之计”。“自是以来，数见亦不敛避，时时流目送睐”。玉井因为两家贫富悬殊，并不敢接受桂珉的爱意。但桂珉却继续以村姑质朴自然的举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她为了能和玉井直接交谈竟然亲赴谢家，当玉井问她“姊氏何为惠顾寒舍”时，她恍爽答道：“来省老母。吾惟丧母，故重人之母，同于己母。”——如此回答，实际上等于已经表白自己愿嫁玉井了。但玉井仍以齐大非偶为由不接受桂珉的追求，在此情况下，桂珉又请徐媪向玉井道意，并透露出自己对玉井出海捕鱼的牵挂。故

事的结局有些戏剧性：蔡家受村人械斗之连累而破产，蔡翁瘐死监中。桂珉“既理父丧，家但壁立”，此时玉井始向桂珉求婚，“女可之，逾年生一子。”桂珉对玉井的追求，虽然大胆主动，但并无任何轻薄之举。林纾对桂珉这种“稍稍涉于自由”的恋爱，给予了明显的宽容和理解，因此他在跋语中又这样说：“究之男女之爱，全球皆然，须有学问为之界域，可不至于乱也。”

既然林纾已容许他笔下的人物在恋爱中“稍稍涉于自由”了，显然，在林纾言情小说所阐扬的爱情伦理中，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不再占有第一条规的位置了——尽管林纾并不准备放逐这一条规。但是，怎样保证这种“恋爱”不会因为“涉于自由”而变成“乱爱”呢？这是清末民初那个时代刚刚倡导新式婚恋时必须及时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在当时的一些追逐“时尚”的青年心目中，“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林纾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这就是爱情必须“得情之正”，即确认爱情是一种超越金钱、门第、私利、肉欲的纯洁而高尚的感情。林纾言情小说中所写的爱情，凡是已“稍稍涉于自由”的，无一不是这样一种纯洁而高尚的爱情。例如，《盈盈》所写是一个俗家子弟和被迫出家的尼姑的恋爱故事。在这个爱情故事中，书生施鉴对盈盈的追求，既不计盈盈当时已无家可归的穷苦境况，也不计盈盈身入佛门这一经历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他所看重的只是盈盈的美貌和善良；《柳亭亭》所写是一个良家子弟与秦淮名妓的恋爱故事。书生姜瑰之所以心向柳亭亭，绝非只是慕色，否则当柳重病几死时他完全可以视若路人。因此，他们二人之间的爱情同样是纯洁而无俗念的，正如姜瑰对柳亭亭所说：“若两心相印，留待后期可也。”如果说《盈盈》《柳亭亭》的故事多少有些传奇色彩，那么，在《春雯》这篇小说中林纾则通过普通家常的婚恋故事，再次强调男女相爱必须“得情之正”。《春雯》所写是一个充满坎坷和伤感的爱情故事：薛春雯与表弟潞儿一起读书，互相爱慕。但春雯父却嗜利入骨，硬是把春雯许配给成都李姓富翁之子。春雯恹恹如罹重病，潞儿闻讯亦心痛如割。后来，春雯因故几成残废，成都李姓富翁因之悔婚。潞儿此时虽已中举，但却坚请父母向薛家求婚。他对母亲说：“人之所贵，贵相知心。姊意似久属我，乃为豪夺。今在难中，吾不之娶，将张眼见我心中人填于沟壑耶？”显然，在林纾看来，爱情必须冲破金钱、门第、私利、肉欲等世俗观念的羁绊，提升到“贵相知心”的精神高度。林纾的这一观念，在另外一些小说的跋语中也多有表露。例如，在《赵倚楼》的跋语中林纾就曾这样说：“天下深于情者，但为一己行乐谋耶？……以此为情，则但谓之图淫而已，去情不啻万重。”

## 二、林纾言情小说爱情伦理的传统风致

林纾的言情小说同时又有着浓重的传统风致。这源于林纾对男女恋爱必须“律之以礼”的强调。林纾既然已容许他笔下的人物可以“稍稍涉于自由”了，因此他所强调的“礼”自然就不可能是传统礼教对婚恋自由的那种刚性限制。林纾的言情小说所肯定的“礼”主要有如下三种义涵：

其一，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礼俗仪式化。林纾的言情小说中并没有完全美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统礼俗，《春雯》、《藕茜》等小说都有部分内容揭露了僵硬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给儿女造成的不幸。但是在林纾看来，或许此类不幸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礼俗本身的罪过，而是某些父母为儿女择婚不智的罪过。因此，林纾言情小说中的“父母”与“儿女”

关系，就不像启蒙作家笔下那样经常处于价值龃龉的状态中。他们大都能从长远着眼并体察儿女们的心事，因而也都能得到儿女的信任。例如，《纤琼》中的男主人公赵东觉从吴县来到合肥探视姑母时，发现表妹纤琼正是自己梦中心仪的女子。经过一段相处，表兄妹俩人已心心相印，而姑母对此也已洞之了了。于是，姑母便给赵东觉之母写信，“请以纤琼妻东觉也”。由于父母并非儿女恋爱中的蓄意梗阻者，因此，林纾的言情小说中即使是那些已“稍稍涉于自由”的爱情故事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是一个不可省略的环节。在盈盈与施鉴的爱情故事中，是“佛心仙骨”的庵主代行了父母的职责；在裘稚兰与吕秋士的爱情故事中，是水月庵的盲尼“代作冰人”向裘母求婚的；在蔡桂珉与谢玉井的爱情故事中，桂珉向玉井的求爱从一开始就在其父的庇护之下，但当其父去世后，谢母仍然采取了“乃以人求婚于女”的方式使桂珉不失身份地嫁到谢家；在《谢兰言》这篇小说中，谢兰言与韩子羽在欧洲留学三年，日常交往，已循西俗，回国时“舟人几以二人为未成婚之夫妇”。但正式婚约的缔结仍然是回国后以韩父通过媒人向谢父求婚的方式来完成的。仔细分析一下林纾的此类言情小说，当可发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际上已经被仪式化了：不是儿女们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去婚恋的，而是父母们体察到儿女的心事后才发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作为一种仪式，它的主要功能已由彰显父母对儿女婚姻的决定权转移为显示儿女对自己终身大事的慎重和对父母地位、经验的尊重。

其二，应保持女性的性情之美。在《胡燕玉》这篇小说中，林纾让男主人公薛载琪之母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身非谓女子必须屈抑于男子之下，不过妇司阴政，道主柔顺，古训谓之‘夫夫妇妇’。你不观欧西之妇人乎？前此百余年，欧洲妇人之择婿者，多取武士。果其妇皆悍妒，胡不娶柔顺易制者而嫁之，必须此纠纠洸洸又胡为也？”其实，这也是林纾一贯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林纾言情小说中的女性一般都能有意识地节制自己的情感，在行为上保留着适度的矜持、含蓄和温婉。这里仅以《娥绿》为例作一说明。娥绿偕姨母第一次在杭州西湖孤山遇见杨桑（字闲闲）时，杨桑哦诵苏轼诗的声韵已使她“不忍即行，冀其更读”。但当杨桑邀请她和姨母进巢居阁小憩时，娥绿却“夷犹不即进”；及进，当杨桑与姨母互谈家世时，娥绿虽然“眉棱眼角间，时时注闲闲”，却仍然“不发一语”。次年元宵杨桑又以贺节为名来到娥绿姨母家，娥绿虽然出来相见，但也只是“微与生语，即入”。显然，在与杨桑的接触中，娥绿一直慎守着女儿家的矜持和庄重。娥绿真正比较主动地与杨桑接触，是在元宵节后与姨母、杨桑同游灵隐寺时。这时的娥绿显然已有意识地“为悦己者容”了：“女衣狐白之裘，曳长裙，加以貂帽，风神超出霞外，觉人间粉黛皆成凡艳，不足侔藐姑仙子也。”在登壑雷亭时，娥绿“纤步几蹶”，这才使杨桑有了与娥绿肌肤相亲的机会：“生不期突进扶掖，葱尖软腻，握之如绵，生魂魄丧失，女赧及双颊。”如此笔墨所描写的，当然只能是林纾所推崇的女性性情的矜持、含蓄、温婉之美，而不会是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情感的压抑和束缚，因为娥绿与杨桑之间的恋爱一直在儒雅优美的氛围中“稍稍涉于自由”地进行着。

其三，决不为苟且之事。应该说，由于大量翻译西洋小说，林纾对于西方青年男女在恋爱中过早地偷食禁果并不一概地斥之为淫乱。但是，林纾又认为中西男女交往的习俗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人完全不必要在这方面也盲从西方。因此，他在自己的言情小说中就一直强调相爱着的男女都必须慎守礼防，不可为任何苟且之事。《柯红豆》中的柯红豆是一位女鬼，从其名字上看也应该是一位情鬼。在一个“林深不得月光”的夜晚，书生周量在红豆的墓地“循名而追貌”，不期

然地触摸到了红豆的一只鞋。在此情境下，女鬼红豆并未因此而委身周量求一夕之欢，而是把自己的妹妹绿漪介绍给周量。但因为自己的“褻物”已落周量怀袖，于是又表示愿与周量“来生或践今宵约也”。林纾在跋语中对红豆在特殊情况下尤能秉礼自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若红豆者，可云情中之侠，尤鬼中之侠。月黑林青，男女相语，即使秉礼者，亦难必其不乱，况乃鬼耶？”在《谢兰言》中林纾还特意让他笔下的人物在中西两种不同的婚俗之间作出选择。小说中的韩子羽因担心回国后万一父母不允他与谢兰言的恋爱他就不能与谢成婚，因此希望谢能在回国前循西俗与自己“自由结婚”。但谢思考之后却断然拒绝了韩子羽的要求，她说：“礼防所在，吾不能外越而叛名教。唯出之以正者，容与老母图之。今同在患难之中，偶一不慎，即百死无可湔涤，弟其慎持此意。”韩子羽所说的“自由结婚”自然并不能等同于男女苟且之事，但谢兰言所说的“礼防”也并不能等同于封建礼教。因为既然他们相处已如“未成婚之夫妇”了，他们事实上就已经在较大的程度上冲破了礼教对他们的限制。因此，谢兰言所谓“礼防”云云，其具体的含义其实就是：热恋中的女性必须自尊、自重和自爱，不能把自己的身体、节操轻易地交付给对方。

显而易见，林纾言情小说所肯定的“礼”，从文化渊源上看都与传统礼教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礼教了。其主要特点是保留了传统礼教中那些有利于提高恋爱品位、有利于维护女性人格、有利于发扬民族习俗的健康的内容，而较大程度地革除了传统礼教中扼杀人性、戕害自由的腐朽内容。正因为这样，它虽然使林纾言情小说所阐扬的爱情伦理带有浓重的传统风致，但却不对这种爱情伦理中的现代色彩构成剥蚀。

### 三、林纾言情小说爱情伦理所折射的文化意义

林纾言情小说所阐扬的这种既有一抹现代色彩，又有浓重传统风致的爱情伦理，折射出了林纾这类“老新党”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略。要索解这一问题，需要从林纾何以要倡导这样的爱情伦理说起。

林纾的言情小说创作于民国初年。对于民国初年中国的文化现状，不同立场的人竟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大体上都认为，虽然当时的中国已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的体制，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礼教却从未受到过真正的触动。陈独秀写于1917年初的《文学革命论》中就已经这样断言：“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sup>[3]</sup>因此，新文化派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略就是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犁庭扫穴式的清理和批判。应该承认，在洞察中国传统文化盘根错节，因而一些明显陈腐的道德观念都不可能轻易革除这一点上，新文化派是深刻的。但由于新文化派至少在《新青年》创刊前后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因此，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理性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当年的维新派（即“老新党”）则近乎一致地认为，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民国的建立，更使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礼教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和统摄人心的能力，因而普天之下道德崩解，民国初年政治上的种种乱象皆源于此。因此，“老新党”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基

本方略就是首先恢复对传统文化的信心，重建民族的道德体系，同时与西学沟通，以使传统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毫无疑问，在把民初政局乱象纷呈的根源认定为传统道德崩解这一点上，“老新党”是肤浅的。但“老新党”提出的类似于“返本开新”的文化建设方略，却有助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理性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评价。遗憾的是，在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之争中，“老新党”的见解却被新文化派不加分析地斥为“顽固”和“守旧”，只是到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了“老新党”见解中的可取之处。

林纾当然是一位“老新党”。这决定了他虽然以译介西洋文学名噪天下，但对西学流布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蔑弃传统、心醉西风的现象依然会感到忧心忡忡。在《鬢云》这篇小说的开头，林纾即用较大的篇幅表述了自己对从清末到民初都市社会风尚转移的观感和忧虑：

辛亥之前，自南而北，男女之礼防已撤。其服饰梳掠，渐渐怪异。女子不裙而袴，袴尤附股，急如束湿。忽而高鬟，忽而卷发，忽而结辫，忽而作解散髻，忽而为抛家髻，忽而为古妆，终极至于断发而止。辛亥以后，男子既去辫，则少年貌美者，两鬓刷以胶青，如何敬容<sup>[4]</sup>。今日又轻松为云鬟，加以黑纱之半臂，草冠玉貌，过市时几不辨为男女。“荔香社”里，“小有天”中，佯欢侧笑，流波送睐，彼此神往，都不避人。想今日社会渐渐化为巴黎矣。呜呼！果能为巴黎者，虽不名为强盛，尚称曰巨富。若男不事生产，女不守阡范，但能袭巴黎淫荡之风，不能学法人治生之术，国不国矣。余伤心人也，毫末无益于社会，但能于笔墨中时时为匡正之言。

这段话，再明显不过地道出了林纾创作言情小说时的文化用意，即对全盘西化的思潮予以匡正。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林纾不可能用小说写论文。于是，林纾此类“老新党”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略便自然而然地投注到林纾言情小说的创作之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既非“西化”亦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爱情伦理。细读林纾的言情小说当可发现，小说中所阐扬的爱情伦理不仅从思想观念上折射出了“老新党”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方略，而且从生活图景上呈现出了“老新党”关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具体构想。在这种具体构想中，由于“自由”只是一种可以“稍稍涉于”的“时尚”，因而“传统”依然是爱情伦理的根本或主色调。由此可知“老新党”所试图建构的现代中国文化，不仅不是完全西化的，而且也不是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的准西化的文化，而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略取西方近代文化优点的现代中国文化。自抽象的道理言之，这样一种现代中国文化或许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在“自由”尚不是核心价值观而仅仅是一种“时尚”的情势下，传统中国文化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束缚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封建性糟粕能否被彻底冲垮，传统中国文化能否因此而真正转型为现代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无法令人乐观的问题。这或许就是“老新党”的文化建设方略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未能得到响应的根本原因吧！

[1] 林纾. 畏庐漫录[C].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按：林纾的短篇小说，最初结集为《践卓翁小说》，共三辑，均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第一辑出版于1913年11月，第二辑出版于1916年3月，第三辑出版于1917年6月。三辑共收小说101篇。1922年10月删去其中6篇及部分跋语，易名为《畏庐漫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节所引证的林纾小说，均见《畏庐漫录》，不一一另注出处。

[2] 林纾. 红礁画桨录·序[A]. 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J]. 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

[4] 何敬容，梁朝人。据《南史》卷三十：“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須眉，……常以膠青刷須。”

本文已刊载于《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2期

## 林纾与《东方杂志》

王 勇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林纾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学家，《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旗下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刊物，在它的早期刊发了林纾大量的译作和诗文，成为林纾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本文对林纾与《东方杂志》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林纾 东方杂志 林译小说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于 1904 年创刊、1948 年终刊的一份综合性刊物，是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为长寿的杂志。它虽是一个综合性刊物，但其创刊之始就设立了文学栏目，并坚持到终刊。在长达 44 年的生存历史中，《东方杂志》的文学栏刊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它对于中国近现代转型期文学的贡献并不亚于一一般的文学期刊，可以说它见证和记录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在早期的《东方杂志》(1904-1919)上，林纾的译作占据了杂志相当多的版面，在 170 多期之中至少有 58 期上刊载了林纾的译作，另外还刊有林纾的文 7 篇，诗 7 篇 10 首，词 1 首，可以说林纾与《东方杂志》有着一段非同一般的文缘。

—

林纾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文学翻译大家，在他的一生中，共翻译了 246 种作品，涉及 11 个国家的共计 107 名作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世界知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林译小说作为当时文学翻译的代名词，代表了当时文学翻译的最高水平，引领了一代人的翻译风尚。

林纾的译作一般由两种方式作用于读者，一是直接以书籍单行本的形式售卖至读者手中；二是其译作先在报刊杂志上刊载，继而以单行本的形式面世。林纾早期的译作（1905 年以前）大都是以第一种方式呈现于世人面前，1905 年以后则两种方式并存，但第二种方式似乎更多一些，之所以在这一阶段第二种方式居多，是与中国报刊杂志的大量问世以及报刊市场的形成与成熟分不开的。林纾译作到底有多少是以第二种方式呈现的呢？笔者依据张俊才先生的《林纾评传》一书的“附录二”<sup>[1]</sup>做了统计，如果不算 1912 至 1913 年林纾在北京《平报》上发

表的 56 篇译自外报的评论，那么，林纾的译作中至少有 50 部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共涉及刊物 13 种，各刊物涉及的篇量分别是《小说月报》28 部、《东方杂志》7 部、《普通学报》2 部、《庸言》1 部、《平报》1 部、《大中华月刊》1 部、《小说海》1 部、《妇女杂志》1 部、《中华小说界》1 部、《小说时报》1 部、《学生杂志》1 部、《大共和月报》1 部、《小说世界》5 部。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发表林翻译作品最多的是《小说月报》，共计 28 种，位居前三位的还有《东方杂志》和《小说世界》，各为 7 种和 5 种，也就是说《东方杂志》是刊发林纾译品的一个重要阵地，一个仅次于《小说月报》的重要载体。

从 1906 年 9 月起林纾的译作《空谷佳人》、《荒唐言》、《空谷佳人》、《罗刹因果录》、《鱼雁抉微》、《桃大王因果录》、《赂史》、《戎马书生》<sup>[ii]</sup>等先后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从《东方杂志》1906 年 9 月登载林纾的译作开始，至 1919 年 12 月《东方杂志》改版，林纾译品退出《东方杂志》为止的共 145 期之中，有 58 期上刊有林纾的译作，占总数的 40%；1904~1919 年《东方杂志》发表的小说数量是 30 篇，从篇目数量上看，林纾的译作为 7 篇，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林译小说支撑起了《东方杂志》（1904-1919）的小说栏，特别是从 1909 年 4 月至 1919 年 12 月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的十年中，更是对林纾的作品青睐有加，使林译小说成为早期《东方杂志》文学生命的重要支柱。

## 二

对于《东方杂志》而言，林纾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他的译品首先保证了《东方杂志》文学栏较高的品质。林纾是清末民初的古文大家，他的译作因其深厚的古文根柢而显得文笔雅致，并形成了林译小说独特的文体形式，正如韩南所说：“林纾和他的合作者实际上为中国小说创造了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被 20 世纪头 10 年的文言小说采用。”<sup>[iii]</sup>林纾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翻译潮流，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翻译的最高水平。为了笼住林纾这个翻译界的泰斗和摇钱树，商务印书馆不仅为林纾出版了“林译说部丛书”，而且在引进林纾的译作时给予了最高的稿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林纾译品的出版和刊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呢？郑逸梅在《林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一文中云：“林纾所译之书，大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一百五十六种，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种已出版，有十种散见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小说月报》中，无单行本。有十四种原稿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其中译英书者九十五种，译法书者五十二种，译美书者十九种，译俄书者六种，译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者各得一二种，尚有未注明何国者五种。”<sup>[iv]</sup>这是一九二四年九月林纾逝世后，根据他生前记录而加以统计的。从以上这些数字上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与林纾之间的密切关系。紧紧抓住林纾固然是商务印书馆出于商

业利益的考虑,但也不排除商务印书馆为保证其旗下刊物的内在品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东方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大量刊载林纾的译品也正是为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保证刊物的较高品质。

同时,《东方杂志》还借助林纾的名望增加杂志的销量,创造更多的利润。

《东方杂志》早期历经多次改版,其中1911年的改革力度最大。杜亚泉在1910年《东方杂志》的最后一期上刊登《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兹于今春,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广征名家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大饜足读者诸君之希望。”

《东方杂志》的这次改良“对中国当时的杂志界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它代表了一种现代杂志的崭新理念”<sup>[v]</sup>。改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销量最高时达到一万五千份,为当时各杂志之冠,甚至打破了历来杂志销量的记录。同时,文学也在改良后的《东方杂志》上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不仅刊载了大量的文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惠风的《眉庐丛话》、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等,而且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刊登力度,除了保留“文苑”栏以外,小说也由每期一篇增加到两篇,文学部分的内容也提到“内外时报”、“法令”“大事记”等栏目之前,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感受得到文学地位的提升。1924年在《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的纪念专号上,编者在谈到这一时段的文艺成就时,还不无自豪地说:“本志在文艺方面,也曾有相当的贡献。如前几年的林译小说和石遗室诗话,都是在旧文学界早有定评的。而王静安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尤为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sup>[vi]</sup>

改良后的《东方杂志》大量刊载林纾的译作,虽然其后期译品的质量已无法和前期相比,且受到多方诟病,但商务印书馆依然照收不误。如张元济1917年6月12日的日记中提到:“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往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就林纾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这几部作品而言,《罗刹因果录》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虽非托氏的代表作,但却促进了托氏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国人对托氏的了解。《鱼雁抉微》是法国孟德斯鸠的代表作,今译作《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启蒙运动的先驱者,1721年孟德斯鸠把他逐日记录的在巴黎所见所闻的不合理现象整理成小说,作品假托两个波斯贵族人士到法国游历,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法国社会,以文学的形式揭发和批判法国封建朝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弊端。这部小说以清新明快的散文风格,对法国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肯定了林纾后期翻译中《魔侠传》、《鱼雁抉微》还是比较出色的。《桃大王因果录》、《赂史》、《戎马书生》虽不是名家名作,但透过这些作品也可以让人了解到外国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典

章制度等,也能够让读者在林纾特有的译文体式中感受到古文的魅力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审美快乐。因此,尽管林纾后期的译作存在着草率的问题,但林纾的崇高名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刊物的文学品位和知名度,为《东方杂志》的销量的增加提供了保障。

另外,对《东方杂志》来说,林纾的翻译小说也是实现其启导国民的办刊宗旨的重要手段。《东方杂志》1904年创刊时提出的办刊宗旨是“启导国民,联络东亚”,1911年改版后,其宗旨略有变化,改为“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早期的《东方杂志》注重对国民的启蒙,“联络东亚”就是加强与日本的关系,取法日本。而后者则变为了鼓吹和宏扬中华文明,其刊物的立场和文化重心发生了转移,但即使如此,《东方杂志》也没有完全放弃早期“启导国民”的职责,在《辛亥年东方杂志大改良》中提到“各栏内揭载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美术历史地志理化博物农工商业诸科学最新之论著,旁及诗歌小说杂俎游记之类,或翻译东西杂志,或延请名家著作,以启人知识助人兴趣为主。”“启人知识助人兴趣”和早期的“启导国民”宗旨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强调启导国民以知识的同时,也注重了兴趣而已。由此可见《东方杂志》在改良前后,文化立场有所变化,即从强调“联络东亚”转移到了“鼓吹东亚大陆文明”,但也有不变,即“启导国民”的职责没变。在晚清民国时期,如果要说到“启导国民”,那么知识的来源必然是来自欧美和日本,所以无论梁启超的新民运动和文学改良,还是后来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其思路都是一样的,即取法欧美或日本,因此在那个时代里翻译天然地具有求新和启蒙的作用。林纾的译作受到重视,除了林纾的声名能拉高刊物的品质,增加刊物的销量之外,更内在的原因还在于林纾的翻译和杂志的启蒙宗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林纾的翻译不仅给当时的中国人开启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的窗口,而且也以它古雅利落的文言为许多人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成为这些人学习古文和翻译的另一种启蒙教材。周作人说过:“他(林纾)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决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模仿过他的译文。”<sup>[vii]</sup>“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sup>[viii]</sup>其他如鲁迅、郭沫若、朱自清、冰心、钱钟书、茅盾、庐隐、张资平等,几乎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无一不受到过林译小说的影响。正如阿英所说:“他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了不少第一流作家,使他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促进本国文学发展。”<sup>[ix]</sup>可以说是林纾的翻译小说启蒙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家的文学观念,引导了他们的文学兴趣,并进而影响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正是在这一点上,作为刊登林译小说的重要阵地,《东方杂志》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三

对林纾而言，《东方杂志》是继《小说月报》之后刊登林纾译作最多的刊物。《东方杂志》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最为重要的综合性刊物，一份极为重视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刊物，在它上面刊载的作品必然是非常重要且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因此哪位作家能在这上面刊登作品，其影响力必然会超过《小说月报》等纯文学刊物，必然会提升作家的知名度，更能折射出作家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价值。

《东方杂志》是面向知识分子的一份精英型刊物，号称是知识分子案头必备的刊物。有人认为选报时期（1904-1908）的《东方杂志》是以“吏”和“士”为主要读者对象，“其读者群体绝非普通百姓，而是一份‘眼光向上’、关注如何将民间舆论选择、整合、剪裁以达到‘上传’目的的刊物。相比较于当时致力于下层启蒙的白话报纸来说，《东方杂志》不啻为一份致力于上层路线、以‘开通官智’为己任的文言大报。”<sup>[x]</sup>事实上，这种以“吏”和“士”（学生），或者说主要面对上层社会和知识群体的读者定位并不仅仅适用于选报时期，后来的《东方杂志》同样适合，《东方杂志》几乎成为知识分子及各类学校图书馆不可或缺的刊物，成为青年学生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的窗口。许多人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往往会提到《东方杂志》对他们的影响，如郭沫若1918年创作了自己第一部小说《骷髅》，寄给《东方杂志》，退稿后付之一炬。尽管有退稿后的愤恼，但《东方杂志》在郭沫若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自不必多言。象郭沫若这样对《东方杂志》怀有很深感情，并深受其影响的人并不在少数。林纾的翻译作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作家成绩得到了更充分的肯定。因为《东方杂志》是综合性刊物，受版面所限，一期中刊登的文学作品很少，所以几乎每篇都是精品，是经过编辑人员认真选择过的。据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说，林纾后期的译作“由于质量不高，有些林译小说不能出单行本，只好放至《小说月报》去发表。”<sup>[xi]</sup>可见，《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处理林纾低劣译品的场所，而《东方杂志》则不在其列。林纾的译品大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无疑巩固了他在文学翻译界的泰斗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了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林纾也可以借助《东方杂志》的销量，获得更为丰厚的稿酬。林纾的翻译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先 在刊物上发表，而后出版成书的，在刊物发表时有稿费，出版时另有版税。商务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2-3元，而给林纾的稿酬是最高的，一般是每千字5-6元，甚至还有说给10元的<sup>[xii]</sup>。即使是按每千字6元计算，林纾在《东方杂志》刊登的译作总字数至少在37万字以上，算得稿酬为2220多元，这应该是一笔非常不小的收入了，乃至于有人说林纾的翻译之“所以这样

多产，是与商务的鼓励分不开的”<sup>[xiii]</sup>，更有好友陈衍把林纾的书房比作“造币厂”。总之，林纾从《东方杂志》上获得了应有的报酬，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同时稿酬也更增添了林纾翻译的动力，正如有学者所说：“翻译过一百多部西方文艺作品的林纾，如果没有‘每千字五元’的稿费收入，那么他不仅会缺乏必要的生活依附，恐怕也不会有那样持之以恒的劲头。”<sup>[xiv]</sup>毕竟失去了经济保障，谁都无法生活。

#### 四

林纾除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众多的翻译小说之外，还有一些诗文在该杂志上发表。据统计，文共有7篇：《记翠微山》（1916年13卷1号）、《明湖泛雨记》（1916年13卷2号）、《夕照寺为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记》（1916年13卷3号）、《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序》（1916年13卷9号）、《汪穰卿先生墓志铭》（1916年13卷11号）、《陈墨庄先生传》（1917年14卷1号）、《慎宜轩文集序》（1917年14卷6号）。这七篇之中，既有游记，也有人物的传记，还有文集的序言，从文体的角度来说，算是较为丰富的了。

诗歌方面，有诗7篇共10首：《自徐州看山至浦口》（1916年13卷1号）、《过海藏楼》（1916年13卷1号）、《至沪上居梦旦寓楼涛园三兄弟匪日不至赋呈一首》（1916年13卷1号）、《段上将军以顾问一席征余，余老矣，不与人事独能参将军军事耶，既谢使者，作此自嘲》（1916年13卷7号）、《赠陈石遗南归》（1916年13卷12号）、寄石遗福州（三首）（1917年14卷1号）、《为拔可令妹李穉清补画花影吹笙室填词图并题》（二首）（1920年17卷24号）；另刊有词一首《石湖仙—题双辛夷楼填词图》（1920年17卷14号）。这些诗词都创作于林纾晚年，所以这些诗词之中更多的是抒发怀旧之情，以及抒写老年生活的老病、伤感等。

总之，《东方杂志》与林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发表了其大量的译作和诗文，而且其命运也有着相似之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陈独秀等激进派对《东方杂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商务印书馆迫于压力，于1920年改版了《东方杂志》，林纾的译作从杂志中退出。林纾，这位中国古文的殿军人物，这位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家就这样在《东方杂志》上沉落了。《东方杂志》与林纾，仿佛就是一个隐喻，林纾毕生致力于译介西学，最终落得个守旧之名，《东方杂志》以理性之态度启导国民，介绍西学，也同样落得个不新不旧的“杂乱派”<sup>xv</sup>之恶名。但二者又有不同，林纾一蹶而不振，落得个“殉道者”的惨淡结局，而《东方杂志》却可以通过更换主编和变革而获得新生。

#### 註釋

[1] 张俊才. 林纾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7。张著是研究林纾的权威著作，其“附录二”详细列出了林译著作的出版情况，比较全面，但其中也还有一些遗漏或错误之处。其中《空谷佳人》一篇，在这篇附录中并没有收入。《空谷佳人》连载于《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8-13期，发表时没有注明著者和译者，1907年3月和5月，1911年3月，1913年9月，1914年4月和1920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小说

的单行本。《戎马书生》连载于《东方杂志》1919年第16卷10-12期，这一情况附录中没有注明。

<sup>[1]</sup> 《空谷佳人》连载于《东方杂志》1906年9月至1907年2月第3卷卷8~13期；《荒唐言》连载于1908年8月至10月第5卷7~9号；《罗刹因果录》连载于1914年7月至12月第11卷1~6期；《鱼雁抉微》连载于1915年9月至1917年8月第12卷9、10期，第13卷1~4、6~8期，第14卷1~8期；《桃大王因果录》连载于1917年7月至1918年9月第14卷7~12期，第15卷1~9期；《略史》连载于1919年1月至9月的第16卷1~9期；《戎马书生》连载于1919年10月至12月第16卷10~12期。

<sup>[2]</sup> 韩南著. 徐侠译.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46

<sup>[3]</sup> 郑逸梅. 林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A]. 书报话旧[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32-33

<sup>[4]</sup> 周武. 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J]. 档案与史学, 1998 (4): 47

<sup>[5]</sup> 坚瓠. 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J]. 东方杂志, 1924, 21 (1)

<sup>[6]</sup> 周作人. 林琴南与罗振玉[J]. 语丝, 1924 (3)

<sup>[7]</sup> 周作人. 点滴[M]. “新潮社丛书第三种”.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20

<sup>[8]</sup> 阿英. 晚清小说史[A]. 阿英全集(第8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94

<sup>[9]</sup> 丁文. 体例设置中的自我定位——《东方杂志》(1904~1908)舆论理念考辨[J]. 学术探索, 2008 (5), 119

<sup>[10]</sup> 东尔. 林纾和商务印书馆[A]. 1897-1987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我和商务印书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540

<sup>[11]</sup> 关于林纾的稿酬, 说法不一, 以五元、六元说为最多。如顾颉刚曾说“圣陶尝告我, 谓商务印书馆购小说稿, 以林琴南氏稿出价为最多(每千字五元)。林氏亦慎计字数取酬, 每馆中误数时, 林氏辄去函补值云。”(见钱谷融主编《顾颉刚书话》P248页)即使是郑逸梅自己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他在《林译小说的损失》(1962年7月28日《羊城晚报》)一文中说林纾的稿酬是每千字六元。另一篇文章《林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书报话旧》, 学林出版社1983年, 第32页)中说, 商务给林纾的稿酬是每千字十元。

<sup>[12]</sup> 郑逸梅. 林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A]. 书报话旧[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32

<sup>[13]</sup> 栾梅健.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9

<sup>[14]</sup> 罗家伦. 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 新潮, 1919, 1 (4)。罗家伦批评说:“杂乱派: 这派大都毫无主张, 毫无选择, 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古今中外, 诸子百家’, 无一不有。这派的名称, 举不胜举, 最可以做代表的, 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 忽而工业, 忽而政论, 忽而农商, 忽而灵学, 真是五花八门, 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 他又象新。你说他新吗? 他实在不配。”

## Linshu and the East Miscellany

Wang yo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Linshu was a most famous literature translator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a ancient prose expert. The East Miscellany was a very important synthetical public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Linshu's translation, poems and proeses often published on it, so it was a important published position of Linshu's works. The relation of Linshu and the East Miscellany is discussed in this text.

Key words: Linshu the East Miscellany the translated novel of Linshu



林纾《无量寿尊者》

## 林纾和他的《闽中新乐府》

郭建鹏<sup>[1]</sup>;郭建辉<sup>[2]</sup>

**摘要：**近代文学家林纾，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不仅留下了大量的翻译外国作品，而取材于现实社会的《闽中新乐府》，表达了救国保种的维新思想，唱出了时代的救亡之歌。他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同光体风靡诗坛之际独树一帜，其影响深远。

**关键词：**林纾；《闽中新乐府》；现实主义；影响

林纾（1852—1924），幼名群玉，亦名秉辉；年长字琴南、号畏庐，笔名冷红生、畏庐子、践卓翁、餐英居士、射九、蠡叟，生于福州光禄坊玉尺山小商人家庭。光绪八年中举人。青年时代的林纾，是一位不甘淡薄的“狂生”，早年受外祖母“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的教导，再加上他坎坷的人生遭遇和自强不息的性格，铸就了他摆脱世俗而救黎民于水火的愿望，这愿望像无形的巨手推动他在仕途上奋斗、挣扎。这时候的林纾不仅思想进步，而且在文学领域亦闻名于世。他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奠基者，他一生翻译了 170 多种涉及 11 个国家 98 位作家的小说，其中名著约 40 种。林译小说产生的反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冲破了文化封闭系统的森严堡垒，开拓了通往世界的文学潮流。而其早

期的诗歌创作则以独特的视角“愤念国仇，忧悯败俗着情，发而为讽刺着言。”<sup>[1]</sup>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艺术价值。

光绪二十三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宣告结束,中华民族面临着山河摇曳、神州凋零、万民同悲的惨剧。人们不再迷信清政府靠洋务运动来实现“求强”“求富”的救国之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维新之士在甲午战败的哀痛中勃发而起,此时的北京正在承接着一场巨变的风暴的到来。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志士们在立学会、办报纸,搞演讲、注诗文,并发起了记载史册的“公车上书”运动,这可以说是维新变法的前奏,使在痛苦与灾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早春的一缕生机。此时正在北京的林纾,受康梁的影响,不甘寂寞,和高凤歧等人“扣阙上书,抗争日本占我辽阳、台湾、澎湖诸岛事。”<sup>[2]</sup>同时,最早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西方的先进思想随之而进入,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在康梁维新思想的感召下,感伤时乱,呼唤救国自强的林纾,不再是贫病交迫的“狂生”稚子,他出入士林之中,奔走于大江南北,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肩负着民族危难时刻的风雨,意识到匹夫的职责与价值,占据他脑海的不再是个人的得失与家庭的不幸,而是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命运,自觉的投入到反帝救国寻找解放的历史洪流中来。不过林纾高唱的主旋律不是政治告白、不是学术团体的宣言,而是通过挥舞笔墨扬洒激情的诗歌。1897年,林纾的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诞生了。《闽中新乐府》是林纾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发自肺腑的呼声,其血泪凝聚的篇章再现了他早期的进步思想。亦可窥见他文学观念及思想的嬗变历程。

## 二

《闽中新乐府》共32首,其取材来自广阔的现实社会,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人间悲剧,唱出了时代的救亡之歌。而自幼饱读诗书并拥有深厚古文功底林纾,为什么要采用“新乐府”的形式进行创作呢?他在《闽中新乐府·自序》中说:

畏庐子曰:儿童初学,骤语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姑人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林纾创作新乐府是经过长期的酝酿而勃发出的心声。不仅对传统的以《六经》课少子发出质疑,而且寻觅到了适合初学儿童富有鲜明表现力的文体“新乐府”。从白居易的讽喻诗,从欧西的勃兴中看到了新乐府的现代性。这些早于白话文的白话诗,再现了当时林纾的维新思想。

### 1. 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抨击了清政府行将末日的腐朽内政,对救亡图强之路进行了初探。

1884年,法军进犯我国闽南沿海一带,福建水师兵败马江,洋务派创办的马尾造船厂亦在炮火中毁灭。时隔十年,清政府又败北于弹丸之地的日本。随后俄国、德国、英国等纷纷争夺在华特权并掀起瓜分狂潮。林纾郁结在心中的爱国情怀无法消解,于是奋笔疾书写下了第一首新乐府

《国仇》:

国仇(激士气也)

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高升船破英不仇,英人已与日人厚。沙俄袖手看亚洲,旅顺烽火连金州。俄人柄亚得关键,执言仗义排日本。法德联兵同比俄,英人始悔着棋晚。东洋仅仅得台湾,

俄已回旋山海关。铁路纵横西伯利，攫取朝鲜指顾问。法人粤西增版图，德人旁觑张眼馋。二国有分我独无，胶州吹角声呜呜。闹教哄兵逐官吏，安民黄榜张通衢。华山亦有教民案，杀盗相偿狱遂断。蹊田夺牛古所讥，德已有心分震旦。虎视眈眈剧可哀，吾华梦梦真奇善。欧州克日兵皆动，我华犹把文章重。廷旨教将时事陈，发策试官无一人。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俄人远志岂金辽，德国无端衅屡挑。英人持重迟措手，措手神州皆动摇。剖心哭告诸元老：老谋无若练兵好。须求洋将练陆兵，三十万人堪背城。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诸君目笑听我言，言如不验劓吾舌。

林纾犀利的笔触直接指出帝国主义豺狼的本性：伺机吞噬我大好河山，他们是置我中华黎民于水深火热中的刽子手。林纾对沙俄狼子野心精辟的断言，再现了他超人的卓识。他忧虑的是中国将步印度“为虏为奴”的后尘。“我念国仇泣成血”抒发了林纾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无比关怀。

帝国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可怕可恶的是来自国家内部的腐朽，清统治阶层为了苟延残喘其统治，对外奴颜媚骨，对内凶如虎豹，林纾以幽默辛辣的笔调，刻画出文武百官在内政、外交和军事防御的种种丑态：

关上虎（刺税厘之丁横恣陷人也）

虎来虎来，关上之虎牙爪开。关上人多安有虎，蠢役作威挟官府。小民负贩图营生，截路咆哮闻虎声。虎吃肉，不留骨，官纵虎丁侦绕越。官岂全无恺悌心，当关纵虎防行人。无如比较急于火，宁我负民勿负我。堂皇飞签责虎丁，有船到关船须停。虎丁得钱实腰囊，诈言船过船无错。既将膏血濡爪牙，私货过关关不哗。有私易行无私滞，小民私纳成常例。丁饱其余始及官，官丁附丽如肝肺。民间罚款重于税，二分归公八归吏。罚款储为比较资，虎丁长饱官不瞞。皇帝抚民瘼，不知此辈穷形恶。不行比较弊更深，专行比较丁复虐。只有加税全免厘，厘金统问进口索，庶几虎患无由作。

这首诗揭露了晚清政府苛捐杂税的繁重，更可恶的是关卡吏役的为非作歹和中饱私囊，商贾苦不堪言的社会黑暗的一角。苛政猛于虎的灾难在贪官污吏的操纵下愈演愈劣，连卖灯草的老汉也难逃此劫：

灯草翁（伤贫民苦于税券也）

灯草翁，卖灯草，日得百钱养衰老；力疲脚惫行蹒跚，冬苦严寒春苦潦。百钱匀做两日餐，嗽声达晓焦肺肝。半间破屋旁村店，忍饥不卖存余羨。此屋留为市槽钱，估值曾无四十千。突来厮役猛于虎，清里税屋归官府。里保借差逐处行，严征无论上下户。翁言老人屋，不税五十年。官人哀贫独，胥吏犹见怜。闻官风节甚严正，奈何行此虐民政？米贵柴昂百不堪，想官未审闻阎病。差言官亦无奈何，难言抚字须催科。催科近行比较法，法所不贷官则那。差言未已翁挥泪，留房不卖翻为累。脱我身上衣，质我床间被。里保邀差醉村肆，老翁哀痛号天地。被去衣亡满瓦霜，凄凉通夜长无寐。

灯草翁简直是卖炭翁的翻版，老汉辛苦劳动一天，刚刚能够维持生命的延续，留有半间草屋指待百年后换作寿材，然而屋子也要纳税。没有钱可以缴税，里保和差役凶狠的“脱我身上衣，质我床间被。”质来的钱却被他们“醉村肆”了。官差们对百姓是如此的残酷无情，而对外敌却软如羔羊，面对敌人的尖船利炮“敌来均是空壁走”。更有甚者，“海口无兵内无备，先讲修齐后平治。黑烟江上敌舰来，舰来何意君为猜。”（《哀长官》）敌人驱舰船来了，守疆大吏完全没有迎战的准备，愚蠢的连敌人为何而来都不知道。祸国殃民、处处退让、卑躬屈膝的讨好洋人的官吏怎能承担保种救民的重任，除了作阶下囚还能挑大梁吗？

西方侵略者除了文化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外，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掠夺，在经济上的掠夺使中国传统的民族工商业日益萧条，大量的农民破产、工人失业，：

谋生难（伤无艺不足自活者）

谋生难！谋生难！西人夺我华人餐。西人艺事皆精绝，西人巧压华人拙。一针一线皆西来，华工失业殊堪哀。西工制自公司出，集股鸠工利归一；更有公家保此工，不惰不羸工夫密。吾华官民隔如天，官虽久任无十年。只求无事免大计，岂能管及民工艺。富商畏官如畏虎，即倡公司敢集股？失业愈多民愈穷，四周环顾无乐土。我思华人失所长，弊在重士轻工商。士人着艺学宰相，终身长蓄三台望；试思四万万人中，几人能到黄扉上。口头治国兼齐家，人人画出书痴状。书痴复书痴，开豁当何时？到头无艺足糊口，数行尺牍难上手。谋生难，心力殫！先求一艺养妻子，再休妄想大学士。

林纾不仅批评了中国历来奉行“重士轻工商”的政策，而且抨击了大多数人追寻抱着诗书走仕途的当官梦，鄙视掌握技术学工商的思想。落后的产品无以抗衡海外舶来品，官方禁止经商的政策导致民族工商业的停滞不前。面对“四周环顾无乐土”的工商业状况，林纾提出了集股办公司、引用先进的设备、提高操作者的技术水平等，摆脱了洋务派办企业走旧路的思想 and 轻实业重军事的做法。体现了他的维新意识。

要自强，不仅是外在的行动，更多的是人们思维意识的转变。千百年来八股取士和程朱理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林纾看到危害国家发展的正是饱读程朱理学之士。于是嘲讽有加：

御使台，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破蓝衫》）

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獭驱鱼》）

有时却亦慨时事，不言人事言天意。（《知名士》）

这些颛顼无能、因循守旧的腐儒，在关键时刻提不出救国良策，更可恨的是依旧做着“封一隅之见，以沾沾者概五洲万国。”（《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夜郎自大的美梦。中国的国土被列强的钢枪洋炮轰的支离破碎，“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破蓝衫，一着不可脱，腐根在内谁能拔……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求人才。”（《破蓝衫》）林纾一语破的，指出读书士人们置国家安危不顾，一心追逐功名的旧习俗。对科举取士的失望，促使林纾把振兴国家的重任寄托于儿童身上。“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村先生》）表现出他的超前和远大的目光。

## 2、对妇女悲惨人生的哀怜，提出了妇女解放之路。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一直处于最底层的地位，她们不仅受封建礼教的压迫，还有来自生活的苦难。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要求争取独立，从夫权的藩篱中解脱出来的呼声越来越大，一直到近代，随着封建礼教的没落和西方文化的介入，这种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林纾“忧闵败俗”的诗篇，最有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在提倡男女平等和对妇女命运的关注。他是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中最早提倡女权、女学的一员。他站在妇女解放潮流的前列，并为之而鸣不平。

自古以来，中国重男轻女之风始终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林纾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指出此弊对女性生命的轻视和残无人道。在《水无情》中写道：

所恨儿无口，魂儿不向娘亲剖。娘亦当年女子身，育娘长大伊何人。若论衣

食妨兄弟，但乞生全愿食贫。岂知聋聩无头脑，一心只道生男好。

一个无知的小生命，还来不及睁眼看看大千世界的一缕阳光，就被无情的溺死水中。她有什么罪过呢？不就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吗！她的死并不是父母的心狠，而是“还要将来再费钱，何如下手此时先。”的时俗所为。这凄绝哀婉的呜咽，在为屈死的无辜唱生命的挽歌。死者带着对生命的依恋一路惆怅的走了，侥幸活下来的生命体，灾难也接踵而来：

#### 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馐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侬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惶；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弗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年亦如汝。但求脚小出入前，娘破工夫为汝缠。岂知缠的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小。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破屋明斜阳，中有贤妇如孟光，搬柴作饭长日忙，十步九息神沮伤。试问为何脚不良？妇看脚，泪暗落，缠来总悔当年错。六七年前住江边，暴来大水声轰天，良人负贩夜不返，娇儿娇女都酣眠。左抱儿，右抱女，娘今与汝归何所。阿娘脚小被水摇，看着母子随春潮。世上无如小脚惨，至今思之尤破胆。年来移家住城旁，嘻嘻活鸟檐间鸣。邻火陡发神魂惊，赤脚抛履街上行。指既破，跟且裂，足心染上杜鹃血。奉劝人间足莫缠，人间父母心如铁，听侬诉苦心应折。

缠足之风始于五代，延续到清末民初，此陋俗来自夫权对女性的压抑和摧残。阿娘在给女儿缠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遭受的磨难，没有忘记在泪水中度过的童年，可为了女儿的后半生，不得不心如铁石的为女儿缠足。缠足的切肤之痛还没有摆脱，随之而来的是生存的悲苦。为了活命，早早的来到富贵之家做女佣：

忆侬七岁来主家，初离父母心如麻。新衣围著半丝茧，小髻曾簪几朵花。饥寒云是阿爷死，阿娘卖女离乡里。临行抱女夜夜啼，防人见哂语声低。谓儿冻馁和娘死，寻个高门与汝栖。……青丝一束蓬蓬乱，清晨有人灶下叹。不叹食人残，不叹衣裳单。不叹欹枕眠不安，不叹震喝摧心肝。只叹主人顾，撩的家婆怒。……轻烙腮，重扼吭，背上寸寸皆仗疮。旧疮未愈新疮蓄，大杖几几折其足。……

经历生死离别的断肠愁绪后，抱着美好的梦走进深宅大院。梦幻破灭了，她进入的不是人间而是阎罗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主人对她撕心裂肺的呼号与叱责，可气的是男主人对她纠缠不休的“浏览”，无辜的躯体成为女主妇发泄嫉妒之愤慨的载体。生命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倍受煎熬，何时女性才能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真正的享受生命的快乐和自由！

妇女要摆脱这种人生的困境，只能靠自己寻求解放的道路，哪里有解救的良方，林纾以其睿智的眼光提出了兴办女学，让女子普遍接受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点历经了几千年之后终于在近代被打破。首先是上海办起女子学校，这一创新之举让林纾感到兴奋，在感慨之余写下了《兴女学》：

#### 兴女学（美盛举也）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志。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气母气本齐一，母苟蠢顽灵气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为书痴。陶母欧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相切磋。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

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领右职，典签多出夫人力。不似吾华爱牝鸡，内人牵掣成贪墨。华人数金便从师，师困常无在馆时。丈夫岂能课幼子，母心静细疏条理。父母恩齐教亦齐，成材容易骎骎起。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长期被锁在深闺高墙内的女性，虽然地位卑微，但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对子女的启蒙教育。林纾引经据典诉说了女性无知的缺陷。似陶母欧母的女性在历史上屈指可数，而“不似吾华爱牝鸡，内人牵掣成贪墨。”的事实更彰显了其反面的影响。兴女学既是复国仇、报国志，又是妇女解放思想和人身自由的途径。

不缠足、兴女学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解除女性被奴役的地位和人格的压抑，更在于使中国发展成为文明、富强的国度。林纾在女性自身处境这个范畴内高唱兴女学，接近近代“女性主义”的实质，带有鲜明的“前现代”色彩，既符合国情而又具有现实意义。

### 三

《闽中新乐府》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急待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文，具有时代的进步性。这部诗集成书于百日维新之前，是林纾前半生最宝贵、最辉煌的历程。就他的艺术特色和社会价值来看，影响是深远的。

#### 首先，继承了白居易、元稹的现实主义传统。

林纾自幼从师薛则柯习读杜诗，杜甫及其继承者白居易和元稹的现实主义诗作触动着他的灵魂。甲申中法之战至甲午中日战争，社会的动荡不安，似乎回到了一千年前的天宝年间，出身卑微、生逢乱世已是生命的不幸，灵魂还要承受国将亡、民将灭的沉重的打击。爱国主义思想时刻要喷发的林纾，自然而然的形成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的传承者。

他在《梅花诗境记》中又说：

大抵诗者，不得已而言也。忧国思家，叹逝怨别、吊古纪行，以人情之所本有者，播之音律，使循声而歌之，一触百应，乃有至于感泣者，若《谷风》、《桑柔》、《板荡》、《离骚》、杜甫《北征》诸作是尔。

可见，林纾最首肯和推崇的是自《诗经》至杜甫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创作传统。而且他认为诗歌应该是“以人情之所本有者，播之音律，”这样才能从现实社会中挖掘题材，达到发挥“诗言志”的传统诗歌理论。特别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对林纾有直接的影响。白居易在《新乐府·并序》中说：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诚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sup>[3]</sup>

这些理论林纾在他的《闽中新乐府》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在《自序》中就毫不掩饰的说：“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这里说的“体”实际上就是指乐府诗的内容，指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真实的反映。林纾真正继承了“文章合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继承了白居易《讽喻诗》“补察时政，泄导民情”的风格。在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有《捕蝗·刺长吏也》，《闽中新乐府》中亦有《哀长官·刺不知时务也》；白居易有《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林纾亦作《郭老兵·刺营制也》；白居易作《阴山道·疾贪虏也》，林

纾也写《关上虎·刺税厘之丁横恣陷人也》。然而社会变了，不再是李唐时代了，林纾的新乐府创作没有在体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把自己的满腔爱国热忱融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全诗充满救国的呼声，以百姓苦乐、国家存亡为己任。如：《郁罗台》“讥人子以斋醮事亡亲也”；《落花》“伤贫馁极流娼盛也”等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和时事性。融爱国精神、批判精神、时代精神为一体，客观的叙述和描绘社会，从社会生活中取材，是《闽中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的重要标志。

### 其次，形式活泼，通俗晓畅的语言特色。

《闽中新乐府》系民歌体，多以口语入诗，其语言通俗流畅、质朴活泼，直抒胸臆、不事雕琢，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和华丽的辞藻，行文洗练、布局严谨，表情达意委曲尽致。促成林纾谋求活泼、浅易的动机，来源于新乐府的体式 and 文坛新风。新乐府的“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sup>[4]</sup>而且白居易在新乐府的创作中，非常注重语言的运用，除了形象、生动之外，还注重语言的通俗易懂，使之达到“老嫗能解”的地步。林纾在继承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也传承了白居易的语言特色。使他能够：“俚词鄙语，旁收杂罗。”<sup>[5]</sup>极尽行文如流水之能事，用浅白、直率的语言塑造了形象鲜明的人物群像。如《破蓝衫》：“破蓝衫，一着不可脱，腐根在内谁能拔！”仅仅 15 个字，一幅穷酸、迂腐的旧学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生骷髅》：“生骷髅，生骷髅，眶陷颐缩如猕猴。”一个眶陷颐缩、形销骨立的生骷髅的形象，赫然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语言的浅显畅达，近似白话；艺术上重视真情实感的流露、个性的自我张扬；再现了林纾在维新时代最基本的诗歌见解。

### 再次，《闽中新乐府》在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适曾经中肯的评价过《闽中新乐府》：

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明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过很通俗的白话诗，一一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sup>[6]</sup>

从胡适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闽中新乐府》这部响应维新的诗集不仅证明了当时林纾的思想是进步的，是与康梁的维新运动相呼应的。同时，他的诗歌主张在客观上继承了近代以龚自珍、魏源等开辟的进步诗歌的传统。在形式主义的宋诗派席卷诗坛的情况下，林纾能够坚持“以自然为工，以感人为能。”进行诗歌创作，是积极的、进步的。

林纾的《闽中新乐府》问世以后，在诗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诗坛新秀都效仿林纾，把新乐府当成维新的武器和战斗的号角，通过创作大量的新乐府诗歌来抵御外辱，掀起了救国的热潮。如 1903 年在《江苏》上发表了署名冶公的《金陵新乐府》，还有 1904 年《大陆报》署名亢虎的《大风叹·北京新乐府之一》，再如 1903 年在《湖北学生界·汉声》署名六岳的《新乐府十八章》。在当时有名的《国民日报》在发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刊登了近 50 首新乐府诗歌，其中不乏著名诗人的创作。如柳亚子《哀新党乐府》，吴趼人《端阳新乐府》其中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是叶楚伧，他用新乐府之体写了近 40 首乐府诗歌，几乎可以与林纾相媲美。自林纾后，在清诗坛上新乐府创作蔚然成风，这风气的形成离不开林纾的开创之功。

林纾在中年前特别是维新变法时期，利用“乐府”的形式传达了他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和要求统治阶级维新救国的思想。走在了救国图强的先列。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参考文献：**

- [1] 朱羲胄：《贞文先生年谱》卷一世界书局，1949年。
- [2] 《林畏庐先生年谱》卷一，《国学专刊》1926年第1卷第3期。
- [3] [4] 白居易：《新乐府·并序》，《白居易全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
- [5] 魏瀚：《闽中新乐府序》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 [6] 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北京《晨报六周年纪念赠刊》1924年12月。

作者另有《末世悲悯与救世之音：漫谈林纾〈闽中新乐府〉》刊载于《作家杂志》2010年1期。



搜艺搜 古玩图库 [www.findart.com.cn](http://www.findart.com.cn)

《采菊归庄》



## 闽都大讲坛“人文林纾”讲座走进福建工程学院

5月18日下午,《闽都大讲坛》于文传系演播厅与福建工程学院学子首次见面,本次讲坛的主办单位是福州市委宣传部,由福州市社科联协办,福州电视台、福建工程学院文化传播系、福建工程学院校宣传部、校团委承办。此次讲座特邀福建工程学院林纾文化研究所所长、文传系教授苏建新为主讲。文传系08级、09级、10级学生代表出席了本次讲座。

讲座上,苏建新教授通过十二个关键词对林纾人文要素进行详细的讲解。讲座伊始,苏教授先从福建工程学院校训“真、诚、勤、勇”展开了对“大学学什么、人才成长、如何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等问题的讨论,他用4个“学”告诉在场的同学们要学会知识、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和人交往。随后,他通过

林纾的故事为在场同学进一步讲解了人文情怀的重要性，他分别从“故园情深”、“胸怀天下”、“和而不同”、“浩然正气”、“冰雪肝胆”、“以史为鉴”、“礼赞爱情”、“关爱生命”、“仁者爱人”、“诗意人生”等方面入手，结合了林纾生平的故事给同学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为了增加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苏教授还结合许多文学知识如孔子的“仁道”、庄子的“处世之道”让同学们更加具体地认识和了解人文情怀，让在场的同学们获得启迪。

《闽都大讲坛》进入福建工程学院，不仅为工院学子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且为文传学子进一步了解人文情怀搭建了一个平台，讲座的举办，为工院文明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使林纾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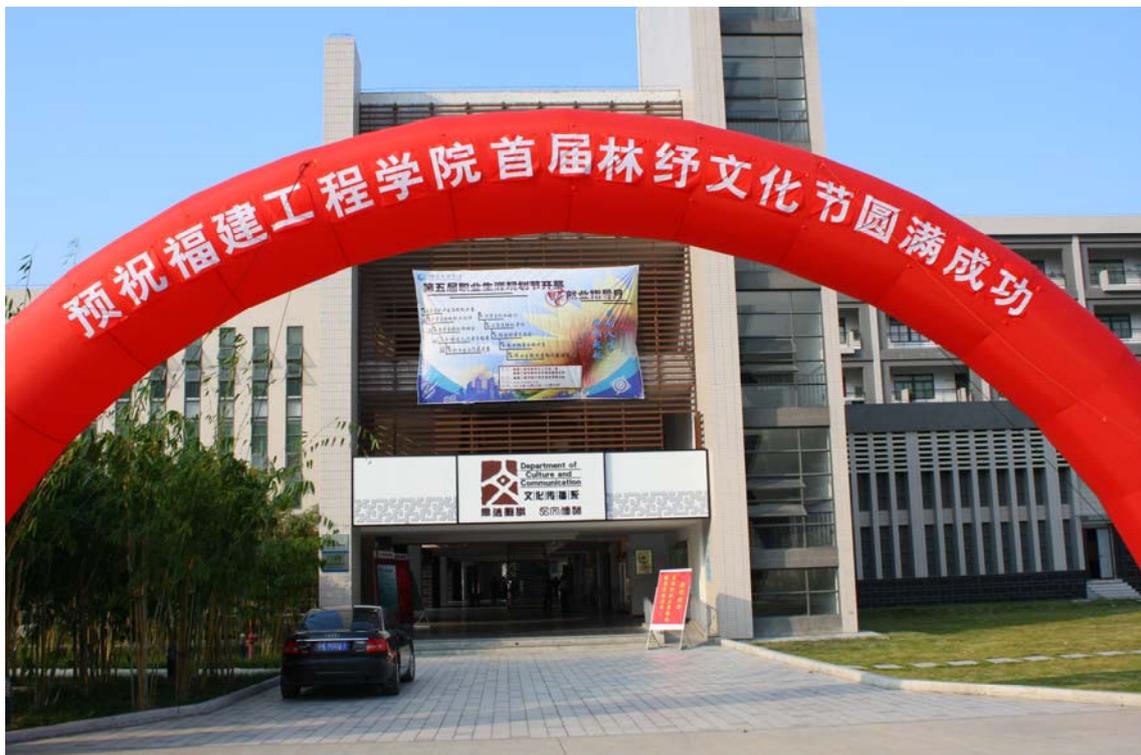
（编辑：林峰、胡宽正、庄玲娥）

<http://tw.fjut.edu.cn/article.php?id=764>

《人文林纾》已由福州电视台播出，在线收看地址：

<http://www.zohi.tv/folder4/folder876/2011/07/2011-07-17165038.html>

<http://www.zohi.tv/folder4/folder37/2011/07/2011-07-10163249.html>



##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 2012 年将在湖南大学召开

近日接到邀请函，获悉此会相关安排情况。

### 一、会议主要议题：

1.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2. 辛亥革命后近代文学的历史走向
3. 湖南近代文学的“新”、“旧”之争

### 二、会议时间：

暂定 2012 年 3 月 29 日报到，会期三天。



草舍柳村图

# 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

## 小说分会年会综述

刘青青 龙莹莹

(济南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2011年10月13日至17日,由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联合举办的“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小说分会年会”在济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中国台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中西与雅俗:各种力量作用下的近代小说”、“辛亥前后的文人与小说”、“近代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等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6篇,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小说研究的多个领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代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蓬勃的生命力。综合会议论文和分组讨论情况,本次会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特色:

### 一、新文献资料的披露、关注与研究空间的拓展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文献资料、史实描述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本次会议在新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

1895年6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布《求著时新小说启》,出资悬赏征集时新小说以革除鸦片、时文和缠足等“中华积弊”。次年3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出《时新小说出案》,说明征文活动共征得小说162部,但是此后这些小说一直未见行世。2011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原藏柏克莱大学图书馆的《清末时新小说集》,在近代小说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刘德隆(上海杨浦教师进修学院)《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获奖作品序文钞》对这次征文获奖作品的“序文”进行了整理,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信息。刘琦(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中国近代“新小说”的先驱——〈清末时新小说〉简介》对征文获奖小说择要作了介绍,认为这些作品可谓中国近代新小说的先驱,它们的问世为近代小说研究以及如何认识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小说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郭长海(长春师范学院)《民国第一小说,民国第一剧本〈血泪黄花〉》对近代小说家陆士谔创作的小说《血泪黄花》以及据此改编的剧本《鄂州血》进行了

细致分析，认为这两部作品写出了武昌起义的整个历史风貌，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崭新的样本，而且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和戏剧史上都应当有重要的地位。胡全章（河南大学）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小说大家徐剑胆考论》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徐剑胆的小说创作资料，论文《徐剑胆考论续篇》指出：民初北京白话报人和白话报小说主笔在《白话捷报》、《爱国白话报》、《北京白话报》、《小公报》、《北京白话报》、《实报》、《实事白话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徐剑胆依托京津白话报刊，发表了400种以上的小说，其创作总量当以千万言计，是近现代北方通俗小说作家群中的杰出代表。在学界普遍认为近代报刊和小说活动中心均在上海的语境下，对于清末民初京津白话报刊小说家徐剑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长期以来颇为冷落的近代北方都市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此外，胡志德（美国加州大学）《美国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概况》为我们了解美国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状况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赵晓林（济南日报社）《素隐书屋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涉及比较重要的文献问题，并对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而近代小说界如何在已有文献史实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发掘和有效运用小说及其他相关文献的问题，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

## 二、研究角度的丰富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推进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海峡两岸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下，“辛亥前后的文人与小说”、“辛亥革命与近代小说”成为本次会议的讨论热点，表现出近代小说研究有意识地与重大政治、学术文化事件相关联、相呼应的特征，也带有回顾和反思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意味。袁进（复旦大学）在《略谈辛亥革命对中国小说的推动》中指出：辛亥革命带来的推翻帝制和政治法制改革，曾经对民初言情小说的突破，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初以“和尚恋爱”、“寡妇恋爱”的小说为言情小说的发端，就是在辛亥革命促动下形成的。长期以来，受五四新文学家的影响，一般读者对近代小说的关注，大多停留在晚清小说，对民初小说往往不够重视。其实，辛亥革命曾经推动了近代小说的发展，使民初小说呈现出与晚清小说不同的形态。晚清的“言情小说”缺乏表现“人”的意识，民初的“言情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尽管也缺乏“人”的意识，但它们似乎更注重揭示爱情悲剧的内在性，在作品展示的客观形象上，具有比晚清“言情小说”更为丰厚的内涵。这一变化，应当归功于辛亥革命带来的时代变化。这篇文章提出了近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解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文学的深层次关系、如何评价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学史现象。因为受到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近代文学研究界曾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文学思潮、文学创作（包括一般所谓“鸳鸯蝴蝶派”）给予“低潮”、“退步”甚至否定性评价。因此，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准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的演变过程

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从小说到戏曲：〈红楼真梦〉的文体转换与文化内涵》指出：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做《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变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郭则澐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含有深远的文化内涵；从晚清以来的文化发展与世道变迁来看，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馀，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段怀清（复旦大学）《主笔——小说家与晚清小说中的“启蒙主义”》探讨“主笔—小说家”这种身份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由于“主笔—小说家”的复合身份使得小说具有多重特性，其中在受众兴趣娱乐及教育启蒙方面的考量兼顾，突显了小说在市场商业化、社会大众化及审美启蒙性诸方面的时代总体关注与具体实践形态。这种小说在社会启蒙方面的认同承担及诸多努力，一方面创造性地转换了传统知识分子在化民群治方面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传统小说从一个封闭的作者核心系统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一个更为开放与自由的小说叙事时代。

季桂起（德州学院）《论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体式变革》认为，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形态，但在叙事结构、方法、体制以及视角等体式上已经体现出现代小说的特点。它在体式变革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抒情小说的出现。抒情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构造和艺术功能。苏建新（福建工程学院）《林纾与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前林纾对现实极度失望，革命爆发后，他由担忧发展到认同、歌颂，辛亥前后的林纾是进步的先知先觉者中的一员。郭浩帆（济南大学）《〈金瓶梅〉续书〈金屋梦〉若干问题摭议》指出，1914年发表在上海《莺花杂志》上的《金瓶梅》续书《金屋梦》为孙静庵所编，孙静庵改编《金屋梦》的方式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及社会思潮变迁影响小说风气发生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卫中、伏涛（苏州大学）《文人“笔孽”与名妓悲哀——以曾朴的〈孽海花〉与樊增祥的〈后彩云曲〉为中心》探讨了真实的傅彩云与作为小说、诗歌表现对象的傅彩云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文学作品对这一原形人物的改造。刘东方、刘伟（聊城大学）《近代小说中的古今穿越——以〈新西游记〉为例》从叙事模式、叙事结构等、艺术风格、艺术手法和词汇语言等方面，分析了它与当下穿越小说的相似之处和渊源关系。刘相雨（曲阜师范大学）《论〈水浒新传〉的改编策略》从主题、形象塑造等方面，对张恨水创作的《水浒传》续书《水浒新传》进行评析，指出《水浒新传》系接续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而来，在继承《水浒传》某些创作传统的同时进行了改编，它的经验和教训在名著

续书中带有普遍意义。侯运华（河南大学）《论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以“哀情小说”、“倡门小说”为主》从小说家的主体意识、文本内含、叙事模式等角度，探讨民初小说的现代特质。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玉梨魂〉：爱情悲剧和人生哲理的诗化表现》指出，《玉梨魂》不仅通过爱情悲剧形象地展现了礼教吃人的罪恶，也彰显了人生存在的深刻哲理，并且通过填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鸿沟，使之获得了植根于个体情爱而又超然于个体情爱之上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姜维枫（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孙了红侦探小说面面观——兼与程小青小说比较》从叙事、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方面讨论了孙了红侦探小说的艺术特征。龙莹莹《论〈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补性》探讨了近代狭邪小说代表作《花月痕》中人物形象的互补性，汤克勤《论晚清小说中留学生形象的书写》对晚清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群体做了具体分析。这些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 三、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女性文学是近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次会议共收到有关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论文8篇，它们从多方面探讨了近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指出近代女性文学为“五四”女性作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郭延礼（山东大学）是较早关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者，其《20世纪初女性小说家群体论》指出：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女性小说家群，这个群体大约有60余人。她们的创作既有长篇小说，也有中篇和短篇小说。女性小说是顺应中国女权运动而诞生的，呼唤女权，倡导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提倡女学，成为女性小说最鲜明的主题。从总体上说，女性小说家虽然未达到同期男性小说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高度，但她们在创作中所传达的女性意识，女性特有的思维特征、情感方式和性别视角，以及在艺术上若干新的尝试，却是值得女性文学研究者珍视的。

黄锦珠（台湾中正大学）《女性主体的掩映：〈眉语〉女作家小说的情爱书写》指出：创刊于民国三年（1914）的《眉语》是清末民初罕见的容纳大量女作家作品的杂志。其以“及时行乐”、“消闲”、“游戏”、“花前月下之良伴”为宗旨，男女相恋、谈爱说情的故事是该杂志刊载的大宗，情爱书写遂成为这份刊物俯拾即得的内容。《眉语》女作家小说的情爱书写中，女性主体时而掩蔽，时而浮露，而这种掩映闪烁的影姿，既展呈清末以至民初女权思潮的效应，也映现父权网罗的深重及其缓步的松动，对于现今理解妇女的历史命运与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堃（南开大学）《论秋瑾形象的历史形成及其性别问题》在夏晓虹《秋瑾

之死》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继续探讨，指出清末民初的“女权”论述建立了“女权革命”与“民权革命”之间的特殊关系，秋瑾不满于“女权革命”的不彻底而积极投身“民权革命”，成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而牺牲的女性，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刘青青（济南大学）《近代中国女性译者及其文学翻译活动概述》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女性译者分为西方来华女传教士译者、本土非宗教人士女译者、《女铎》报女译者三个群体，并对她们的译作情况及相关史实做了初步梳理。此外，朱秀梅（河南大学）《“我”的出走与回归——晚清新小说女性形象分析》，杨萍、潘超（长春师范学院）《〈歌场冶史〉中杨柳青形象的时代性》，黄湘金（西南大学）《道德与情爱——论清末民初小说中女学生的“自由结婚”》，刘铁群（广西师范大学）《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女性观念》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近代追求个性独立与自尊的女性，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精神的救赎。

#### 四、研究领域的延伸与学术视野的开拓

假如以一般所说的“近代”（1840-1919）为中心，本次会议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有意识地向前后两个维度延伸的趋势。

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向“近代”之前追溯。范丽敏（济南大学）《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的三种文化精神》指出：中国古代戏曲与小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处于最下层的市民大众的文化精神，正面的为讲究诚信、公正、睿智和义气，负面的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市侩主义；二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遵从的正统文化精神，正面的为忠孝节义，负面的为愚忠、愚孝、愚节、愚义；三是处于最上层的、为少数精英文人所具有的哲学文化精神，表现为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人的价值、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的思考 and 探索，带有人文主义萌芽之色彩。乐云（广东工业大学）《沉醉与微醒——19世纪初期历史小说的双重文化心理》认为，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初期的历史小说展现出中国近代思想走向的两种不同维度：一方面，既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辉煌记忆中不能自拔，复古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盛行；另一方面，随着内忧外患的逐步深入，对时局敏锐而焦虑的小说家的忧世心态也充分呈现出来。左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蜃楼志〉：一部中国商人的“神话”》指出：以粤商为主角的小说《蜃楼志》，寄托着作者为时代和社会提供的一种拯救性力量，为中国古典小说带来了崭新的艺术视域。杨思颖（长春师范学院）《论〈林兰香〉中的梦意象》探讨明末清初世情小说《林兰香》梦意象的运用及其作用，指出小说将梦意象融入到人物塑造和情节演变之中，通过各种梦意象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世事的洞达和人生的感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向“近代”之后延伸。耿传明（南开大学）《狂人

形象的文化源流与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气质》指出：五四新文学是以鲁迅《狂人日记》这样的非常态人物和非常态叙事为开端的，这种现代“狂人”的出现成为新文学标示其自身文学文化特性的突出标志；《狂人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于文化鼎革之际通过传统自然人性论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结缘重新激活了疯癫与文明这一古老命题，五四“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立足于自然人性论的道德浪漫主义态度的复兴。清末民初文学异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深层差异是由淑世型到勘世型的文化气质的转变，前者出于一种人类追求协同性的愿望，后者出于一种人类追求客观性的愿望。五四新文学以唯我论和唯理论的文学形态出现，将为协同性文化所压抑的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追求解放出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别开生面的价值和意义。李生滨（宁夏大学）《鲁迅文学以小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概论》指出：在清代朴学精神和新文艺启蒙思想影响下，鲁迅在中国小说研究方面取得的开拓性成就，体现了其疏离经学、沉潜杂学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思想，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和文化转型中文化价值转型的必然结果，而且对鲁迅现代小说创作和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意义影响极其深远。在强调鲁迅现代小说创作杰出才能的同时，不可忽略其既有学术传承、又立足现代批评立场的中国古代小说和古代文学研究。刘殿祥（山西大同大学）《“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的翻译文学——从近代到现代》认为，鲁迅的文学翻译经过了从近代到现代的漫长历程，体现了中国翻译文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特征，同时也标识出中国文学经由近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特性。付建舟（浙江师范大学）《〈域外小说集〉的超前性与翻译研究中的失语症》指出，《域外小说集》在启蒙思想、直译风格、诗学观念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使有的研究者产生了严重的失语症，即丧失自己关于文学翻译研究的话语权，无视前贤时彦论断的片面性，无视域外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使《域外小说集》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刘丽霞（济南大学）《近代来华圣母圣心会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将近代天主教来华传教修会为整体考察对象，深入探讨了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联。

此外，赵利民、陈子萌（天津师范大学）《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赵连昌（山东财经大学）《梁启超晚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与价值》等论文继续关注近代人文精神和学术思想，并对近代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进行了探讨；苏建新《走向世界/文化的2010年林纾研究》、谢超凡（华中科技大学）《俞樾通俗小说研究的学术史意义》、李希望（天津师范大学）《当前近代文学研究中的“早秋精神”》等论文，则表现了近代文学研究中学术史意识的自觉和加强。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出现并逐渐加强的这种追溯式、延伸式研究，拓展了近

代文学的学术空间，壮大了研究队伍。这种情况通常会带来新角度、新问题，甚至有可能带来新的学术习惯和范式。无论从近代文学研究角度还是整部中国文学史角度来看，都是可喜并值得期待的现象。

济南大学召开的“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国内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次聚会，也为国内外同行接触、沟通搭建了重要的平台。作为连接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近代文学具有特殊的学科地位，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次会议取得的很多成果，提出的很多问题，将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从而对中国近代小说乃至近代文学研究事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 徵稿

琴声投稿、联络地址：

**350108 福州地区大学城闽侯上街福建工程学院林纾文化研究所文化传播系 苏建新**

**手机：13459491579**

**邮箱：13459491579@139.com, hbxgsjx@tom.com**

---